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中华文化学院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GAN SU TONG ZHAN
LI LUN YAN JIU

2024 年
第 **3** 期
总第73期

准印证号（甘）LK6200056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GANSUTONGZHANLILUNYANJIU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73 期)

封面题字：何鲁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目 录

主管单位:

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中华文化学院)

编委会成员

主 任: 孙雪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玉真 王亚莉

石岱千 刘仲奎

李晓霞 张耀宇

杜怀明 尚勋武

苟天宏 郁川虎

赵金云 赵凌云

郭天康 姬安岳

秦 禾 秦忙龙

敏隆邦 葛建团

蒲晓贞 霍卫平

统战理论新思维

完善大统战格局等六则 (4)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实践·理论·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重逻辑 尹文华(6)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 陈 东 向继友(14)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

统一战线发挥网络代表人士应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作用探究
..... 刘利平(20)

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作用和路径研究
..... 卢传红 仰叶齐(24)

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意义、现实困境和破解路径
..... 赵雪芬(29)

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伟大政治创造研究
——基于党际关系比较 梁晓宇 李文迪(33)

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不断提高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
..... 王 凯(40)

2024年第3期(总第73期)

2024年9月20日

民族理论与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孔子民族观的理解维度与现实应用 陈佳敏(48)

安宁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经验 王雄刚(50)

文化·历史·人物

爱国主义精神视域下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及时代价值

..... 刘传雷 初金哲(53)

集体记忆转化为社会记忆的凝聚力

——以哈布瓦赫理论分析纪录片《决战兰州》 王润博(5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指引研究

..... 王 涛 肖安俊(63)

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 张全钰(68)

2023年全省统战理论研究成果转辑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 省工商联(72)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路选择

..... 兰州交通大学(76)

主 编:王亚莉

副 主 编:贾玉生

本期执行编辑:张凤玲

责 任 编 辑:张凤玲

王 昊

卢婉春

闫丽红

马 霞

常海哲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安宁西路818号

邮政编码:730070

电话:0931-7634058

0931-7783804

传真:0931-7783804

电子邮箱:

GSTZLLYJ@126.com

印 刷:

甘肃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统战理论新思维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同志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关键是要扭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要健全统战工作责任制,明确党委(党组)以及党员领导干部的统战工作责任内容、履责方式、重点任务,建立健全统战工作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的有效机制。要完善统战工作领导小组运行机制,理顺领导小组机制和统一战线各领域日常工作机制的关系。要聚焦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建立健全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长效机制,完善统一战线各类主题教育和政治培训制度、同党外人士联谊交友和谈心谈话制度,赋予每项工作以凝聚人心、加强团结、增进共识的意义。(摘自《人民日报》2024年8月5日)

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姑再努尔·卡德尔同志指出: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是要在民族地区开展教育引导工作,增强各民族之间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激发各族人民的凝聚力,积极促进各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宣传教育手段,创新教育活动的形式,包括利用网络、影视、新闻媒体等多种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中,让全民族共同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营造出民族平等、团结、和睦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通过给予政策支持、给予招商引资政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推进民族地区的共同富裕。三是推动跨民族交流,鼓励不同民族地区之间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并在商业、旅游业、工商业等方面的交流,并提供政策支持。四是加强民族地区的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教育培训、公正选拔将对党忠诚、德

才兼备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推选出来,为其提供晋升机会、发展空间和到一线的实践锻炼机会。(摘自《河南经济报》2024年9月12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 樊继达、庞凯同志撰文指出:要优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首先,地方政府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放管服”改革的精神,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推动行政审批改革,实现行政审批流程规范化、精简化、便利化。深入推进“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对行政审批项目下放、整合,提升行政审批效率。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最多跑一次”,通过“一证化改革”“一窗式”办理让民营企业办事更顺畅。其次,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合理弱化政府对市场的规制性作用,以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政府不仅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更多便利条件;还要发挥“有限”政府的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体制机制的约束,为企业发展松绑减负。同时,通过构建清正廉洁的政商关系,降低民营企业家用来维护与政府关系的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用于生产性的经营管理投入。(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4年第7期)

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迁航指出:全面构建“亲”与“清”有机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关键在于落到实处。各级政府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重要指示与部署要求,从制度性、延续性和方向性这三个维度采取务实举措,切实推动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一是强化制度机制保障,破除领导干部“清而不为”的政商关系困境。在引导领导干部做到“亲商、安商、富商”的同时,也要设法解除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后顾之忧。地方政府应当依法依规、因地制宜,出台政商交往负面清单、容错免责机制等举措,激励领导干部

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二是加强软性制度建设。政府为企业提供的软性制度已成为影响政商关系、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因素。要加强新型监管机制、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建设,完善产权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等商事制度改革,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经营管理的制度性成本。三是制定配套措施。配套措施是政策落实和制度执行是否有效的关键环节。要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政策或制度落到实处,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因地制宜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措施,贯彻落实中央意志和要求,做到执行政策不走样、落实要求不打折。二是坚持依法行政,推动政商交往行为法治化。通过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对领导干部履职用权进行了约束,为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明晰了互动交往的行为界限,引导政商交往走向“亲而有度;通过严厉打击政商交往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政商交往应当是坦荡的君子之交,而不能在觥筹交错、勾肩搭背中形成官商勾结。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干预经济活动、接受不法分子拉拢腐蚀等违法违规行为,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摘自《廉政文化研究》2024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同志指出: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几个关键方面:一是从价值观上寻求包括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全体社会成员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并以此来引导宗教中国化。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对于多民族多宗教的中国而言,民族的和睦、社会的和谐,都需要宗教的和睦,需要在宗教独特的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体系之间寻求最大共识即最大公约数。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为在价值观上产生共识提供了根本基础。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并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信教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可以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力量。三是从根本政治保障上,坚持和加强党对宗教中国化的领导。宗教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决定了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必须长期坚持和加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一项复杂敏感的工作,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开展工作。(摘自《科学与无神论》2024年第2期)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继龙同志指出:要在“进行伟大斗争”中推进文化“两创”。一是要从实施主体上防范消极“妥协顺从”思维观念的干扰。“妥协顺从”的思维观念是一种消极扭曲的对待事物矛盾问题的表现。在对外文化交往中,不能混淆文化的“妥协顺从”与文化的包容,后者是一种秉持积极的文化妥协观,它的有效彰显只有与积极有效的斗争辩证统一起来,才能够推动文化积极健康发展。二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忧患意识中汲取居安思危的辩证智慧。居安思危理念内在蕴含着“积极妥协”与“坚决斗争”的辩证智慧,是抵御“妥协顺从”思维的制胜法宝。忧患意识是居安思危理念的内核,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底色。破解文化“妥协顺从”的思维误区,需要立足党进行伟大斗争的现实基点,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居安思危理念,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与各种消极颓废思想做坚决斗争。三是要把传统文化智慧转化为党带领人民战胜消极懈怠、抵御风险挑战、进行“伟大斗争”的精神动力。要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催生自我警醒,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维护文化安全。要防止主观割裂文化交往、煽动文明对立冲突的错误做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放在与各种价值观的较量与激荡、比较与鉴别的过程中实现。要抢抓机遇、创造条件,防范和化解文化领域的危机挑战,抵制西方文化霸权,要勇于揭露、批判文化虚无主义的本质,在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化危为机,用开放包容的姿态发出求同存异、携手共赢的时代强音。要坚定理想信念,提高理论武装能力,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摘自《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9期)

责任编辑:张凤玲

实践·理论·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重逻辑

尹文华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实践—理论—价值”三重逻辑。立场、特征、优势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逻辑的重要构件,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其鲜明立场,与毛泽东文化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一脉相承是其显著特征,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其最大优势;习近平文化思想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新时代全球文化发展新形势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应有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关键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华现代文明

2023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及其重大意义,并对当前和今后的各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为主要内容之一的改革任务,从精神层面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具有人民性、实践性、系统性等鲜明特征。只有沿着“实践—理论—价值”三位一体逻辑路线,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深入理解和全面认识其中的内容、特征、精髓及价值。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逻辑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正确与否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之路在地域上涉及国内国外,在时间上与过去、现在和将来息息相关。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诚信等基本内容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民主思想,早在古代氏族社会,黄帝、尧、舜、禹等氏族部落首领都十分注重听取臣民的意见。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作为外朝的“国人大会”这样的民主议事制度。对于此,《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职》记载:“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墨子认为,要通过民主的方式选贤任能,这样才能避免天下大乱。正如他所言:“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近代以来,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使“民主共和”思想蔚然成风,并在中国形成“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3]的民主主义观念。关于自由思想,孔子主张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庄子的“逍遥游”等等,都闪烁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新时代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1XJJA710004);“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兰州理工大学)”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SZJS62010731);2024年度兰州理工大学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计划“新时代推动甘肃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3/062406)。

作者简介:尹文华,男,博士,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着自由之光。关于诚信思想,从《论语》“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商鞅立木取信到季布一诺千金、晏殊信誉的树立,再到薛瑄的“信以接物”、王永斌的“一信字是立身之本”,从理论表达到实践过程都很好地把“诚信”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表现出来。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生的先进思想、科技成果、文艺作品等,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不竭动力。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上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针对社会问题和人生理念有不同的看法。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墨家倡导爱人如己,反对战争;法家秉持依法治国、以术强国的政治理念。百家争鸣的思想精华在中国思想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奠定了文化自信的基础。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的出现,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中国古代《诗经》《离骚》《两都赋》,以及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元曲、四大名著等,铸就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蕴含的诸如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等是人类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生存之道。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在《论语》中提出“和而不同”思想,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明示尊重、包容差异或不同,反对抹杀、否定差异或不同。文明只有在不断向前发展和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才能进步。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隋唐时期商人、使臣往来不绝,先有玄奘西天取经,后有鉴真东渡日本,马可·波罗记录的他在元代中国的所见所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热烈向往,对后期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明代郑和下西洋为传播华夏文明,促进中国与亚非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古中国文化政策的开放包容、文学艺术的绚丽多彩、文化产业的繁荣发达,推动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也铸就了优秀传统文化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要义。这些要义顺应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发展趋势,与当今时代主题相契合,充分体现在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4]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立足于新时代全球文化发展新形势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新时代全球文化发展新形势。“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5]新时代新征程,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的快速创新与应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流互鉴更加广泛深入,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凸显。但是,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人类社会总趋势背道而驰的不利因素使大变局中的“变”愈演愈烈,给国际社会和谐稳定造成巨大冲击。特别在文化领域,“变”表现得更加明显。首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运用多种手段,对他国展开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攻势,特别针对中国,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一系列诋毁中国国际形象的论调此起彼伏。其次,数字帝国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利用新型网络手段对他国进行文化渗透,其方式更加隐蔽、传播速度更快、涉及范围更广、时空约束力更小,更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通过演绎美国的巨人形象大肆渲染西方奉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合理性,推广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理念。最后,在新型科技的影响之下,人们的主体性日渐被抹杀。数字技术本来应该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由于人们过分依赖它,出现了“反客为主”的局面,人们被数字技术所控制,数字异化现象、文化消费主义等大肆盛行,严重威胁世界文化安全。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环境中孕育而生的。

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八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分别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论断,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中心任务,为先进思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观

点新论断,科学制定大政方针和战略策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多措并举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各方面需要,特别在文化领域,我们党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两个结合”等重大命题论断,召开重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文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形成《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强化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举措,开展“净网”“清朗”治理行动,使网络健康文化盛行于世。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北京文化论坛等许多重要主场外交活动和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这些都满足了人民追求更高水平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有力推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目的使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正是这“三要”在新时代的真实体现。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定文化自信的体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终推动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的自信心进一步增强,文化主体性得到有力体现。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开放包容。进入新时代以来,无论是理论层面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实践层面举办一系列体育赛事、世界文化论坛,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世界谋大同”这一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开放包容”文化立场,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生。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创新的结果。“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6]。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7]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目的使命是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习近平强调:“对人类文明最大的敬礼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8]人类文明形态指称人类社会实践的组织方式,与社会形态一样,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9]与其它文明形态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文明形态,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10]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到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科学发展观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国共产党已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对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性,并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和发扬这一重要精神的基础上,领导人民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奋力迈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最终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力推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提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程度,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目的使命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前者为后者指明了方向,后者为前者贡献了力量。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逻辑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的作用非同凡响。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11]故此,从理论维度深入探究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尤为重要。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立场

首先,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凸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为民本色。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布局的叙事图景,顺应了历史发展大势,顺应了人民需求,目的

就是为了让人民富裕、幸福起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制定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任务书,即从包括文化在内的五个层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作出了安排部署;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等。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化是重要内容,文化建设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并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条红线。

其次,在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凸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为民本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文化事业产业发展作出新的安排部署和战略规划。较以往主要关注于物质生活,新时代人民群众更加关心精神文化生活能否与物质生活协调发展、精神文化生活能不能更加丰富等,并且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愈发强烈,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改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品质、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已成为党在新时代面临的主要任务。对此,党中央审时度势,在作出重大论断和确立重要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新变化,积极顺应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不断努力为人民创造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最后,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凸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为民本色。单从人这个层面来看,正确的价值理念是精神向导和行动指南,对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步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从人民立场出发,对内对外大力弘扬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开放性等鲜明特征的、以“坚持人民至上”为精髓的价值理念。对内,我们党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明确提出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理念集中体现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此同时,我们

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好地构筑中国价值,为推进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稳定、个人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对外,我们党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而使这一“中国主张”深入人心,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全面进步贡献了中国力量。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一脉相承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以贯穿毛泽东文化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基本遵循。毛泽东文化思想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中。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推动新中国科学文化大发展、文学艺术大繁荣,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用富有时代性的思维意识解读“双百”方针,并在其指导下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在坚持“双百”方针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二为”方向,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此影响之下,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的开展起来,国内文学艺术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得“双百”方针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的指导作用愈发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特别强调发展文艺事业要坚持“双百”方针,要发扬民主精神,要创造各抒己见的宽松环境。“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12]。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13]。正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强调和坚持下,“双百”方针的地位愈发重要。总之,“双

百”方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贯穿于毛泽东文化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之中。

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化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孕育于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想均具有自由、民主、人民性等共性,并且始终贯穿与时俱进的共同鲜明品格和精神特质,已经深深地注入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液和灵魂中,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一面精神旗帜。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规定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有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即在坚守自身作风和气派的同时,需要大量吸收国外先进文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规定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世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14]在文化艺术民主方面,毛泽东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1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国家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价值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要素之一“民主”凝聚了全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在坚持文化独立自主方面,新民主主义文化主张内容上要保持尊严和独立,在形式上要有民族特色和中国气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重大理论观点,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增强了文化自信。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在总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两个结合”重大意义的同时,着重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坚持走自己的路。”^[16]在文化创新方面,从江泽民指出的发展先进文化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到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再到习近平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17]和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这些都无一不闪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新”的熠熠之光。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

首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

论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进入新时代以来,大国关系迈入全方位较量新阶段,围绕国家和民族形象、主流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文化斗争愈演愈烈,文化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一言以蔽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机遇和风险并驾齐驱,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面对此现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平等、谦虚的态度,追求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尊重世界各国文明,倡导用具有包容性的文明交流取代文明隔阂。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深刻总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并强调在新的起点上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进行文化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可以看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很好地运用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着眼解决国际社会在文化领域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国际社会实践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用“开放包容”代替了当今西方国家向他国的文化输出或意识形态渗透,是对极具包容性中国形象和“求同存异”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其次,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充分体现“六个必须坚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在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等等,这些都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一立场观点方法的体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领导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这是“必须坚持自信自立”这一立场观点方法的体现。“两个结合”的首次提出,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被进一步提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华文明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充分体现“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这一立场观点方法。正是意识到文化繁荣兴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这一立场观点方法彰显得淋漓尽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和

文化发展,针对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论点,对文化工作布局作出详细的部署要求,推动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真正实现了理论、实践、现实三者有机统一,充分体现“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一立场观点方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生,充分体现“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一立场观点方法。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逻辑

价值有许多不同种类,哲学视域中的价值指称主体与满足它的某种需要的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这种特定关系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关系。从价值维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客体,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不同种类主体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主要通过前者对后者的意义表现出来。

(一)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应有贡献

紧扣时代主题,首次创造性地将“六个必须坚持”运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体系。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六个必须坚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满足人民新的文化需求和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为主要目标;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强调“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强调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网络安全、新闻舆论管理等问题,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问题,重视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问题,重视如何更好地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实现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共同发展;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强调以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借鉴吸收国外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积极回应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文化

建设问题,从文化领域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贡献。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重大科学论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新局面。一系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同马克思主义主张的联系观、人民至上思想、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等价值理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来讲,“第二个结合”象征着一个新的文化名词的诞生,从而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最新成果的问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不仅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指明方向,使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力,有力推动其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发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除此之外,“第二个结合”象征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的开拓,在本质上体现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样就为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丰厚的精神滋养而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有力外部条件。

锚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目标,首次系统阐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形式和内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形式多样、内容充实,主要涉及文化的概念界定、文化的本质、文化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文化的特性、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这些突出特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为“第二个结合”和新文化的产生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作出了应有贡献,从而成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要求我们必须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体现了唯物史观及增强历史思维能力的重要性。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要求我们始终弘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神,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及

增强创新思维意识的重要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要求我们始终秉持“大一统”理念,体现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的理想追求及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要求我们始终“树立‘一盘棋’思想,把自身发展放到协同发展的大局之中”^[18],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系统观。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要求我们始终“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19],体现了恩格斯晚年时期的和平过渡思想、列宁的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思想及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平发展理念。中华文明的这些特性既是对“何谓中华文明”的集中概括,又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中国表达”。

(二)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有利于实现文化繁荣兴盛。目标导向、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实现文化繁荣兴盛作用的主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对待文化、如何发展文化、文化发展的目标方向等,为实现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了根本遵循。“文化传承是推动文化繁荣的先决条件”^[2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象征着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正因为如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得到全面加强,为实现文化繁荣兴盛提供精神力量。要实现文化繁荣兴盛,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大力弘扬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民意的价值理念的同时,从多措并举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层面发力,缔造出富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文化,有效诠释了“发展”这一文化建设的永恒主题,从而为实现文化繁荣兴盛奠定坚实基础。

更加坚定了中国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底气主要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深厚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阐发新时代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态度,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精华。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文化立场、文化目标和任务等几个方面系统阐发了新时代我们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态度方面,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2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道德精华,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上提出的四个伟大精神,即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些都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极大提升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底气,极大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另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国家繁荣富强、世界和谐稳定发展为价值旨趣,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中国形象的生动表达,支撑起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筑牢了中国人文化自信的信念基石。

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的文化使命任务、文化方向方针、文化创新等论点,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增强了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精神力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任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任务,其言简意赅、内涵丰富,为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擘画出清晰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向和重要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重申这一方向方针的重要性,并强调要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方向方针,从而为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远大目标和科学方法。此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创新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从党的

二十大报告把“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确立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到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不仅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有利于充分调动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从而为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不竭动力。

(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与时代主题相契合,应对了全球的共同挑战。当前,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国际社会合作与共赢的价值追求没有变。然而,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建设、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等一系列国际性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人类再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文化发展怎样才能符合时代的主题?如何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文化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的国内外会议中所强调的论点回答了这两个时代之问。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习近平提出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即是否与时代主题相契合,并强调“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全面系统总结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之一就是突出的和平性,并特别强调“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理念。由此可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已经解答了这一问题,或者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已经明确地给出了历史性答案。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始终秉持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使命理念,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

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相一致,加快了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进程。何谓美好的世界?美好的世界就是要“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2]。建设美好的世界体现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新时代全人类对和平、发展、繁荣等向往的集中反映,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

在新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世界发展新形势,审时度势,提出一系列有利于推动文化多样化发展、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观点新主张新理念,从文化领域不断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这些新观点新主张新理念和所强调的这一论点都是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世界、满足世界人民需求发出的“中国呼吁”,同时也是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传承发扬“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和合共生”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时代价值的集中体现。

与世界发展大势相符合,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为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顺应全球文化发展形势,始终秉持暖民心、顺民意的文明观,大力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3],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国家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全球发展大势,契合时代发展主题,符合世界人民普遍需求,体现了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必须看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实践基础具有包容性,这一鲜明特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完全是一致的,二者共同表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追求的目标取向的最大公约数,勾画出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的价值的最大同心圆,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正确理念引领。

参考文献

- [1][1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 2024:14.39.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 [3]孙中山全集【M】.(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297.
- [4][6]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 2023(17).

(下转第28页)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 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陈 东 向继友

【摘 要】推进乡村振兴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同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又具有价值引领作用。然而,当前乡村振兴依然面临着产业发展失衡、人口人才流失、文化落后、生态环境污染、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等现实羁绊,阻碍乡村振兴的全面有效推进。鉴于此,要抓住乡村振兴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发展数字乡村、激发人才活力、弘扬文化自信、坚持绿色发展、强化基层党组织等路径,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的高水平乡村振兴,才能实现“产业兴旺、人才聚集、文化融传、生态宜居、组织健全”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振兴 人才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建设。^[1]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党中央在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新形势、新战略为乡村振兴建设指明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有助于打破城乡隔阂,缩小区域收入差距,赋予农业农村现代化元素,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力量和有力推手。鉴于乡村振兴机制构建向度广泛,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研究视角,立足于乡村振兴的三大特征和五大方面振兴,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的路径建设。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路径建设,必须立足于“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理念,从理论维度、学理基础、现实羁绊、建设路径等多个方面,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最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服务。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3]为此,党中央做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乡村振兴研究也因此成为学界焦点。因研究视角不同,各方观点也存在一定差异。目前大致存在以下三种较为典型的观点:一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论”。这一观点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为视角,认为乡村振兴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是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规律。^[4]诸如在英美德日等发展国家,城乡不平衡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共性问题,为缩小城乡差别,各国都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推进乡村振兴建设。^[5]这对于我国推进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二是产业驱动论。这一观点认为“三农”发展动能由传统的农业转换为新型产业革命,为中国式现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基于网络舆情大数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动态及引导(项目编号:2023AH050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 东,男,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

向继友,男,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代化提供了动力来源,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6]三是乡村治理论。以乡村治理遇到的特定问题为视角,有学者认为推进乡村振兴是系统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所遇到问题的战略选择^[7],还有学者以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特殊问题如乡村伦理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等。^[8]

仔细分析上述研究视角后发现:将乡村振兴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大视域下的研究成果较少,且缺乏乡村振兴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内在机理的研究。乡村振兴必然论突出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强调以现代化发展历史进程为模板,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做法和经验,但是却未给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措施、新理念、新战略,这也反映其学术性的不足;产业驱动论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三农”发展动能转换为视角的研究侧重于“三农”内部具体问题的分析,难免有些避重就轻,宏观性不够,问题意识不强;以乡村治理为视角的研究将系统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所遇到的问题归于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却忽略了乡村文化和村民主体性精神对物质文明的滋养作用。为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及驱动机制,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推进路径。

二、乡村振兴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来看,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既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凸显并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可以说,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建构,形成了乡村振兴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内在机理。

(一)推进乡村振兴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乡村振兴的三大价值遵循与五大特质,都体现了乡村振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城乡平等、要素聚焦和以人为本,是乡村振兴的三大价值遵循。城乡平等,就是使得乡村和城市一样具有同等的经济地位和发展效益,强调乡村农民和市民一样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要素聚焦,就是充分调动和优化乡村的各要素充分促进生产资源和生产要素配比流动,实现乡村产业、组织、生态等方面的最优化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同时要保证乡村

农民的权益,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和发展依靠人民的辩证统一,使得农民有充足的权利追求美好生活。这些特征的价值指向均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在本质上是吻合的,它们具有共同的价值旨归。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乡村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秉持“以人为本”的宗旨,强调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都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乡村振兴的实质就是实现乡村现代化,其内在逻辑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一,从人口规模巨大来看,乡村人口占比接近一半,只有乡村农民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乡村人才现代化,才能保障我国农村现代化的推进,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只有与乡村振兴相协调,才能实现共同发展。第二,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来看,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中国式现代化,两者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既要消除城乡收入差异,又要确保农民共同富裕,这体现了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要求。第三,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来看,乡村振兴既要实现乡村产业现代化又要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树立文化自信,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美丽乡村建设,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第四,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看,乡村振兴中的“生态宜居”和“生态振兴”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遵循。乡村振兴能够做到环境保护与现代化建设兼顾,很好地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第五,从走和平发展道路来看,乡村振兴构建城乡共建现代产业体系,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既消除了国内农村绝对贫困,又为国际扶贫减贫治贫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设和平环境。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指明价值引领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乡村振兴,最薄弱的环节都在农村^[9]。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价值引领、动能转换、农业转型,以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对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价值引领的内在机理就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基

本特征和现实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协调农村各要素聚焦构建乡村新发展格局,致力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高度的理论创新指引并解决推进乡村振兴中的实际问题,即“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振兴乡村什么”、“怎样实现乡村振兴”。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决定了“怎样推进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系统的、整体的、长期的现代化,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代化,这就要求花大力气抓经济薄弱的乡村地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及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统一的高水平多层次的现代化,明确了振兴乡村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方面面。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渐进性创新了“怎样实现乡村振兴”这一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是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乡村信息化、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路径导向。将“怎样实现乡村振兴”的落脚点重点放在提高乡村整体经济上,加快推进数字化信息化和新兴工业化,发展多种类型乡村产业,整合乡村上下游产业链,变乡村资源为乡村资产。

(三)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互通共融

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互通共融的学理基础,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系,对理解和认知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而乡村振兴的特征是实现人才现代化,二者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乡村振兴亦是人的振兴,二者的落脚点都是人才现代化。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与社会的联系。实践劳动既是人的需要,也是为了人的发展。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都是人的实践劳动,都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也为全社会成员共享现代化成果。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指向都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者立足于全体人民,遵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是人才,要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是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实践,是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现代化。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推动城乡产业互融共通。农业高质高效意味着在农业生产中,不仅要追求数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量的提升和效益的增加。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水平,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绿色、有机食品的需求。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城乡之间可以共享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科技信息等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合理规划城乡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城乡经济格局。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和推动城乡产业融合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羁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10]为此,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村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但是,在这一伟大过程中,我国面临着诸多现实羁绊,从而阻碍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推进。

(一)空壳化:乡村产业发展失衡

乡村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点,有助于重构生产关系,推动乡村生产力的发展。尽管我国出台很多政策,加大乡村振兴的力度,但目前乡村产业的空壳化是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乡村产业体系滞后。乡村地域广阔,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乡村产业集中度低,科技含量不高,无法形成乡村产业链优势。相较于第二、三产业,农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产业整合难度大、周期长、见效慢,表现为乡村产业体系发展滞后,农业产业体系内部结构失衡。二是乡村新兴产业内容趋同。由于农业资源相对单一,结构相对传统,加之乡村人才匮乏,创新意识不够,导致很多地区新兴的产业项目集中在政府补贴的领域,这就造成乡村新兴产业资源浪费、项目重复建设,缺乏持久创新力。三是传统乡村产业转型受阻。由于科技发展较快,农民的思想受地域、文化、信仰、风俗等影响,导致很多地方的传统乡村产业转型遇困,或者来不及转型就被市场淘汰。四是农户分散市场衔接能力弱。传统的乡村是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无法构建

农户联合体,难以形成规模化产业优势,导致市场交易成本高,市场衔接能力弱。

(二)空心化:乡村人口、人才流失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现代化进程,人口和人才向资源更为集中的大城市迁移是必然的趋势,这就导致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人才流失严重,出现严重的乡村空心化。而人才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村人口和人才的流失严重制约了乡村振兴的发展。这一进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大量农民外出打工,或者为了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而选择在城市安家定居,加之农业收入效率低,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劳作,导致大量土地资源被闲置,农村人口出现“老龄化”、“幼龄化”;另一方面,青少年学生走出农村到城里求学,大学毕业后选择在条件更好的城市就业,导致乡村人才流失和知识精英的逃离。而广大农村地区由于长期缺乏专业技能人才,导致乡村建设的人才储备越来越少、人才梯队不全、人才素质良莠不齐,诸如乡村学校、乡村医院、乡村农技站等。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支撑,亦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如何“留住人口、吸引人才”成为乡村振兴成败的至关重要的一环,这需要精准施策、科学引导。

(三)文化堕距:乡村移风易俗缓慢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灵魂。乡村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助于激发乡村群众的自豪感,增强对家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然而,长期以来,乡村文化和乡村文明的建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各种陈规陋习和封建迷信没有得到根治,移风易俗缓慢,导致乡村文化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明显的文化堕距。具体来说,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自身文化意识不足。当前,我国乡村地区经济发展依然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思想上不重视文化建设。二是乡村文化基础设施薄弱。由于乡村经济发展滞后,资金有限,村里的文化设施建设落后,无法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三是乡村文化人才落后,文化活动单一。因为乡村物质基础薄弱,农民文化程度低,对文化建设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少,因此无法营造出良好的乡村文化氛围。即便部分乡村群众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也流于形式,缺乏文化建设创新意识,导致文化活动形式单一、内容陈旧、人才匮乏。

(四)脆弱化:乡村生态环境污染

乡村生态振兴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基础。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中稳定推进,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出乡村旅游转变为产业化治理,综合软实力得到提升,综合竞争力发生改变^[1]。乡村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助于乡村振兴旅游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构建美丽乡村社会。但是由于乡村生态资源的公共属性和生态圈的脆弱性,加之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这就导致在开发乡村生态资源的同时难免造成生态资源污染,生态环境出现脆弱化的趋势。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乡村生态基础设施薄弱。部分地区乡村生态资源基础设施薄弱,生态资源开发缺乏配套的设施,缺乏事先整体规划,忽略前期市场调研和生态环境评估,只注重短期效益,不兼顾长期影响,造成对生态环境意想不到的污染。二是乡村生态资源文化赋能不足。我国乡村地域辽阔,各地风俗文化各异,各有特色,乡村生态环境资源开发的同时缺乏当地文化赋能,无法形成当地的特色生态环境文化。三是乡村生态平衡被破坏。一方面,部分农民的环保意识淡薄,乱丢垃圾,过量施用化肥农药,污染水源,造成乡村生态平衡被打破。另一方面,部分农民素质较差,不注重乡村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过度开发生态环境资源,导致生态环境平衡被破坏。

(五)失能化:乡村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

乡村组织振兴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保障。当前,我国乡村地区组织形态多样,包括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会、村民联合会等。但是,乡村组织在动员、宣传、领导乡村振兴具体运作中,存在着组织形式单一、人才短缺、组织管理水平低等“失能化”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组织人才储备不足。乡村党组织面临老龄化问题,人才培养意识薄弱,组织管理缺乏专业培训,无法适应乡村振兴出现的新形式新业态新问题。二是组织功能弱化。乡村组织缺乏服务意识,对组织职责和服务内容定位不清,村内没有完善的治理体系,导致组织领导能力不强和乡村治理能力不足,工作形式化,不能深入。三是资金保障体系不健全。乡村经济基础差,生产力落后,农民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这就导致乡村组织振兴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四是组织管理机制不完善。基层组织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人员少、任务重、执行力差,加之

组织之间协调机制不健全,职能部门权责不清,缺乏监督,降低了乡村振兴工作效率。

四、“五位一体”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从世界现代化发展演进史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伴随着侵略和扩张,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从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转型的重要方案。^[12]中国式现代化是系统的、全面的、可持续的现代化,自然包括全面实现乡村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13]。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必然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的高水平振兴,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唯有协同推进、一体发展,才能实现“产业兴旺、人才聚集、文化融传、生态宜居、组织健全”的战略目标。

(一)产业兴旺:发展数字乡村,促进乡村产业现代化

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就是顺应数字化时代所需,调动农业经济一切生产要素,调适农业经济主体之间的数字资源,耦合各要素进行市场化应用,充分利用耦合效应带来的生产增力并将其转化为农业农村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创设数字化农业应用场景,推动农业生产领域产业现代化。充分利用“数字+农业”新发展路径,对农业全产业链生产数据进行实时记录与智能分析,通过数据监测及趋势预判,实现对农作物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全过程的自动化作业,摒弃过往传统“靠天吃饭”的被动式生产,转向挖掘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的主动式融合,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升农业种植的生产转化率。其二,构建“数字+公共服务”应用场景,赋能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诸如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现象,可通过引入数字服务和管理系统,对居家老人的服务需求数据进行统一收集,交由信息平台进行及时全面的分析管理,协调整合周边服务资源,做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系统解决传统乡村养老不便和医疗服务资源不齐等问题,大幅节约养老成本,有效提升服务供给水平与主体满意度。其

三,搭建数字乡村共享平台,推动城乡农业产业现代化。针对“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各级政府要拓展思路,加强城乡交流合作、区域合作交流,提升农村数字基础建设、资源建设、平台建设的能力与水准,在政府、企业、高校、农村主体中构建其紧密的协作关系网,推动城乡产业现代化。

(二)人才聚集:激发人才活力,推进乡村人才现代化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者,也是乡村振兴的推动者。在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中,人才发挥着主体作用,惟有激活人才活力,才能推进乡村人才现代化。激发人才活力,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对农民进行技术、才艺和管理等方面的培训,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通过技术赋权,可以大大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现代化水平。通过技术赋权和赋能,能够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提供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提高农民主体管理效率和科技转化效用,激发农民主体性意识,唤醒他们自主发展意识,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责任感,实现乡村振兴的个体价值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持续推动乡村振兴发挥主体作用。二是吸引外来优秀人才。通过设立人才成长基金,建立本地外出人员和外地“招才引智”联络机制,打好“乡情牌”、“乡土牌”、“乡贤牌”,宣传家乡的创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改善乡村人才结构,提高人才现代化比率。三是留住人才。进一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增强服务意识,对优秀人才给予政策优惠和创业补贴,打破部门壁垒,构建完整产业链,为优秀人才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和扶持,发挥人才现代化效益,让他们安心在乡村安家落户、创新创业、永久发展。

(三)文化融合:弘扬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现代化

弘扬乡村文化自信是唤醒农民主体意识、重塑乡民文化生活、固培乡土文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必要抓手。第一,重塑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乡村各级政府要深挖现有乡土文化中易于传播、便于弘扬的有益部分,激发广大农民创作意愿和热情,通过“讲好农村的故事”树立乡村文化自信,打破现有的主体意识淡薄困境,培育乡村农民文化生活新面貌,增强乡村文化现代化。第二,提升乡村文化发展质量。各村在弘扬乡村文化自信的同时,要注重整合各村落文化要素,将各村的传统民俗、特色文化、历史事迹等进行整合,并赋以现代化文化元素,以高质量发展增强

乡村文化现代化。第三,打造特色乡村现代化文化产业群。将区域特色、地方特色及乡镇特色用现代化技术赋能,通过教育、旅游、文化结合起来,形成特定区域内的集群产业,发挥集群效应,延长产业链条,打造因地制宜的、极具乡土特点的、易于形成集群效应的地区现代化文化产业。乡村文化振兴能够提高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朝着文化产业链整合、各项文化事业协同发展、资源合理利用、文化治理更加完善的目标不断靠近。

(四)生态宜居:坚持绿色发展,共建乡村生态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在乡村振兴中,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打造生态乐业宜居环境,实现乡村生态现代化。要实现乡村生态现代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乡村农民生态环保意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乡村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宣传、组织、领导作用,通过各种形式和各种途径积极宣传绿色发展理念,增强乡村农民生态环保意识。二是持续提高乡村公共治理水平,打造乡村绿色宜居环境。在做好生态文明宣传之外,还要积极提高乡村公共治理水平,采取多种措施改善乡村公共卫生条件。三是构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是乡村发展绿色经济的主要方向,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范式,有助于共同保护乡村生态环境,有序开发乡村资源,繁荣乡村经济。构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要求深入开发生态空间资源,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挖掘乡村优质生态资源,实现乡村多农业态的创新发展。

(五)健全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建构乡村组织现代化

习近平曾指出,为了推动乡村振兴,就必须坚持以“小社会”共同服务“大社会”,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单元建设,这里的“小社会”就是乡村基层党组织。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起着先锋模范作用。加强乡村党组织建设,有助于“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构建乡村组织现代化,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首先,加强农村各级党组织领导。党的领导仍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条件与坚实保障,只有保证党对乡村组织的强有力引领,才能确保乡村振兴的组织领导力、动员力、号召力的不断提

升。其次,加强乡村党员队伍建设。再次,构建多种乡村自治组织。乡村自治组织具有辅助性,可以辅助党组织完善乡村基层管理,引导村民参与议事和协商,发挥村民自主作用。通过定期或不定期会议,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组织自治、自理、自管的功能,搭建起村两委和村民之间的“联结点”,形成了“两委+自治组织+村民”三方协同的乡村组织结构。最后,为实现乡村组织现代化,必须提供充分的保证。乡村组织现代化建设,不能仅仅依靠党员干部自觉,还需要资金、人员、设备等支持,以方便他们更好地工作。

参考文献

- [1][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2-22.
- [2] 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奋斗,2023(06):6-19.
- [4] 黄承伟: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基于理论视野和大历史观的认识与思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5-10+176-177.
- [5] 徐勇:论现代化中后期的乡村振兴【J】.社会科学研究,2019(2):36-41.
- [6] 邢占军,杨永伟: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J】.中国高校社会学,2022(5):47-56+158.
- [7] 郭远智,刘彦随: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与乡村振兴路径【J】.地理学报,2021(6):1408-1421.
- [8] 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2021(12):89-109+201.
- [9] 罗章松,苏雪芹: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路径探究【J】.新疆社科论坛,2022(3):41-45.
- [10]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3.
- [11] 周珂: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茶乡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获得感研究【J】.福建茶叶,2019(3):83-84.
- [12] 段晶晶: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2(6):39-44.
- [13]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N】.人民日报,2023-4-14.

责任编辑:张凤玲

统一战线发挥网络代表人士 应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作用探究

刘利平

【摘要】随着我国信息化水平的快速提升,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借助网络的跨时空传播、自由性、快速性、匿名性等特点发展成为网络舆情。网络舆情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网络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域。网络代表人士因其和网络的密切关系,以及其自身的资源优势、专业优势、身份优势等成为政府做好网络统战工作,应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重要借助力量。

【关键词】网络舆情 网络代表人士 党建引领 意见领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任何政权要实现长治久安,都必须抓好舆论工作。”^[1]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网络成为汇集舆情、畅通民意的重要平台和渠道。^[2]现实生活中,群众的利益诉求如未及时得以满足,某一特定群体围绕某一特定利益极易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往往借助网络的跨时空传播、自由性、快速性、匿名性等特点发展成为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反过来又会对群体性事件产生影响,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网络舆情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网络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域。网络代表人士因其和网络的密切关系,以及其自身的资源优势、专业优势、身份优势等成为政府做好网络统战工作,应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重要借助力量。

一、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特点

(一)主体的隐蔽性

和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时代下的信息传播更为迅速、传播者言论更为自由、参与主体更为隐蔽。网络舆情的参与者可以实名制,也可以匿名,可以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可以穿着隐身衣、带着假面具。网民自恃可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真实身份的限制,

无需为自己在网络上的言行承担责任,因而在网络领域随意发表自己的言论,助推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网络舆情主体的隐蔽性也为网民作出信息真假与否的判断增加了难度,尤其一些别有用心在网络大V带着假面具散播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信息,左右着网民的舆论走向,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控制起到消极作用。

(二)传播的爆炸性

网络世界的开放性和实时性决定了网络信息传播的爆燃性。一方面,每个网民都可成为网络信息的浏览者、传播者,成为网络舆情的参与者,网民只需点动一下手指,一条信息就可以迅速得以传播。群体性事件往往都具有特定的利益诉求,某一领域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出现会引发该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相关的网络舆情也会被相关利益者跟帖、转载。另一方面,网络舆情具有瞬时性的特点,在人们不知觉的情况下,可能一条微小的网络舆情由于某些因素的激发,会进一步得以放大、变得更加复杂,多重因素相叠加,可能就会使网络舆情形成大面积、井喷式的扩散态势。这就给相关部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的建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使相关管理部门面对突如其来的网络舆情措手不及,工作陷入被动局面。

基金项目:2024年度阜阳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课题(立项号:GAYJ202426)。

作者简介:刘利平,女,中共临泉县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

(三)言论的非理性

网络互动平台的匿名性、自由性等特点,为广大网民提供了发表意见、倾诉利益需求的渠道,也使得很多网民随意在网络发表言论,而不考虑自己的言论带来的不良后果。面对群体性事件在网络上的舆情,部分网民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喜好或者他人的评论来发表看法,有时会借助网络舆情发泄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负面情绪,言语缺乏客观的事实依据,部分网民的言论出现个人化、极端化、娱乐化等倾向,语言往往夸大其词、瞎编胡造、语言偏激、言语粗俗,如果再加上网络大咖的刻意舆论引导,网民的理性思考会进一步冲淡,从而人云亦云。网络舆情的“逆向”导向又会助长群体性事件进一步爆发。

(四)过程的难控性

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整个发展过程的控制是有很大难度的,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第一,由于网络舆情参与主体的匿名性,给舆情责任的追究增加了难度。第二,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线上线下互动性也给网络舆情的控制增加了难度。群体性事件的利益诉求未能得到解决,逐渐发展成为网络舆情,网络舆情会吸引更多的社会成员关注该群体的利益诉求,如果带着特定利益诉求的群众到网上寻求解决办法无果,有可能再次通过更大规模的、更加激进的线下聚集等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第三,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网络互动平台数量越来越多,使得网络舆情可以搭载更多的载体大面积地传播。如果相关职能部门或媒体不作为,有可能使得网络舆情由一个地区、单个人、围绕特定利益的事件发展成为不同地区、类似群体,相关利益的群体性事件,引起更大范围的波动,无形中增加了舆情的难控性。

二、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舆情的相互作用

(一)群体性事件形成网络舆情

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拓宽了群众的言论空间,使得更多的群众得以在网上发表观点。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社会生活中的利益矛盾冲突点进一步增加,维权意识越来越高的普通群众在线下采取相关方式进行维权不成功的情况下,往往会在网上表达诉求或者宣泄情绪。群体性事件的核心事件基本上都是涉及政府作风、拆迁补偿、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这些

事件本身就容易激发网民的兴趣点,类似群体或者利益相关者会密切关注,转发评论。一些网络大V出于特定的目的,借助自身粉丝量较多的优势,围绕舆情话题进行评论、分析,借助自身的影响力和粉丝的好奇心来控制舆情走向。媒体因为自身的工作特性,会紧跟事件的发展变化进行及时的报道。这一系列的因素使得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性事件的关注度在网上快速升温,发展成为网络舆情。

(二)网络舆情对群体性事件具有两面性作用

网络舆情最初是群体性事件引发的,但同时网络舆情也会反作用于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对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既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作用。

从消极方面看,一旦网络舆情在网上出现,会快速引起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群体的关注,随着关注人数、浏览量、转载量、评论的增加,舆情快速达到峰值。尤其网络平台的匿名性、自由性,使得广大网民肆意发表自己的评论。客观、真实、科学的评论有利于对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形成正确的导向,但是当下网络上有很多虚假、夸张的言论,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一些谣言,试图主导舆情的走向,不名真相的网民往往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语言更加极端,为网络舆情的发展推波助澜,使舆情朝着一发不可收拾的态势发展。网络舆情又会反作用于群体性事件,使群体性事件的波及面更广,参与人员更多,矛盾更加复杂,发展态势进一步恶化,为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增加很大的难度。

从积极方面看,现在网络成为人们表达诉求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网络也成为政府搜集社情民意的重要平台。如果在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形成的发酵阶段,相关部门能预警到舆情的爆发,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可以把群体性事件解决在萌芽阶段,避免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平时,政府也要多留意网民的言论,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在制定、修改相关政策时,把网络上的社情民意作为一项重要参考因素,以此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因此,网络舆情可以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发展、消退起到一定的预警和导向作用。

三、统一战线发挥网络代表人士应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作用探究

(一)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首先,通过各种方式摸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网

络人士的分布情况和人员统计,严格落实“组织起来”的要求,实现网络代表人士的党建全覆盖。把网络代表人士纳入到统一战线中,充分发挥网络代表人士在网络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和网络代表人士的思想联系和政治引导,引导网络代表人士学习党的政策方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参加统战部门及社会主义学院组织的政治培训、调研考察等活动,自觉向党组织靠拢、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不断筑牢共同思想基础,真正将网络代表人士凝聚起来,形成网络最大同心圆,发挥好网络代表人士在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走向方面的导向作用。

其次,统战部门或党组织要为网络代表人士更好地在网络舆情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充分发挥相关协会、网络人士社会组织的作用,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为网络代表人士建言献策、开展活动、反映诉求提供平台载体。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网络代表人士名额,推荐优秀网络代表人士担任群团组织、统战社团等兼职领导,通过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发挥他们在引导网络舆情方面的优势。

(二)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首先,要按照大统战格局,建立网络代表人士数据库,加强与网络代表人士的沟通联系,对数据库人士进行分类管理、精准管理,关心网络代表人士利益诉求,维护网络代表人士的合法权益,不断优化网络代表人士的发展环境。

其次,不断强化网络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建立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相互配合的网络代表人士队伍。建立网络信息联络员队伍,及时跟踪网络舆情动态。建立网评员队伍,围绕网络舆情中心论点积极发声,宣传正能量。建立网络舆情监督、预警专业人才培养队伍,预判舆情可能的走向,及时采取相关措施予以干预。

最后,建立网络代表人士学习培训常态化机制,加强网络代表人士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领域规章制度的学习,不断提升网络代表人士的法律意识。邀请专业人士对网络代表人士进行传播学、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专业知识的培训,使其掌握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帮助网络代表人士在网络舆情应对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发挥意见领袖作用

网络舆情出现之后,一些网络媒体为了吸引流量,发布很多和舆情事件有关的虚假信息,往往众说纷纭。面对信息不一致的网络信息,网民们更倾向于相信传统权威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的观点。网络人士中的意见领袖“熟悉网络传播规律和网民接受心理,能在公共事件发生后较短时间内策动议题、发酵感情,牵引舆论、凝聚共识、组织行动,对事件处置的影响举足轻重。”^[3]政府部门要加大对网络舆情中意见领袖的识别、培养和管理工作。

首先,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识别与监测机制,及时发现网络中的意见领袖。这可以通过数据挖掘、社交媒体分析等技术手段实现,以跟踪他们的言论动态,了解他们的观点倾向。

其次,统战各部门和媒体应主动和意见领袖建立沟通渠道,加强合作。通过定期的交流会、座谈会等形式,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增强他们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可以邀请他们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解读,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四)加强网络空间管理

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讲,网络媒体让人们获取信息更为便捷,发表意见更加自由,受到的限制、束缚更少,广大网民不分阶层地共同使用网上信息,发表评论。面对这样宽松的网络自由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强调:“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一样,既要有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4]这说明网络世界也不应超越现实社会中无法超越的法律和道德底线。因此,政府要以“互联网+”为抓手,加强网络法律制度和舆情应对制度建设。

首先,建章立制,依法治网。随着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网络立法的任务更加繁重。虽然我国在有关网络管理方面的法律日臻完善,但是随着各种网络新情况的出现,如抖音直播带货的兴起等,我们在网络立法方面的短板也显现出来。因此,相关立法部门应根据当下信息网络发展的新情况,在网络立法方面查漏补缺,根据出现的新情况,及时研究制定适合适宜的法律法规,以保证网络世界的健康有序发展。

其次,加强对广大网民的管理。广大网民是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发起者、助推者,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发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部门

要加强政策宣传,普及网络法律,让网民知道在网上散布谣言,发布虚假信息是违法的,教育引导网民文明上网,合理表达利益诉求。在网络舆情中保持理智的头脑,学会分辨是非,自觉抵制网络不良现象。

(五)健全预警监测机制

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全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瞬息万变,因此,要按照大统战的要求,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预警机制,防范于未然最高效、最经济、最实用的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策略。^[5]

首先,制定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应急预案。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制定对热点话题的发现、分析、研判、报送、级别划分等机制,只有提前建立一套运行畅通的处置机制,才能在真正的舆情发生的时候应对自如,而不会手足无措。

其次,建立互联互通的网络舆情监测平台。要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网络舆情监测平台,各部门之间对监测到的舆情苗头信息要及时互通消息,并汇总上报。要把舆情监测贯穿于舆情的全程,在舆情前期运用大数据对敏感话题进行搜索,密切关注话题的浏览量、转发量、评价量,根据对数据的分析,预判舆情可能的走向,及时采取相关措施予以干预,在舆情爆发高潮时期,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监测和分析,梳理出利益的最大矛盾点,找出意见领袖,有针对性地扭转舆情发展方向。在舆情发生末期,一些次生舆情或者衍生话题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滋生,很有可能再次爆发危机,这个时候利用网络舆情预警系统的舆情跟踪功能,可对舆情的发展趋势进行持续监测,便于职能部门掌握舆情发展的脉络,从而做出有效的预测,避免二次危机的出现。

(六)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根据奥尔波特的谣言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 $\times$ (事件的)模糊性,事件越重大,相关信息越匮乏,谣言就越容易发生和蔓延。^[6]网络舆情刚刚发生之时,是网民好奇心最强的时候,政府要在第一时间在官方媒体公布事件的相关信息,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点,做好群众的情感引导,引导舆情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首先,政府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

公开,要在“黄金4小时”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等会、背景吹风会等传统的官方媒体和政府官方网站、公众号、微博等新型官方媒体及时做出回应,使官方言论迅速占据网络舆论高地,做事件的“第一定义者”,最大限度避免与事件真相相悖的不实谣言滋生蔓延。^[7]

其次,在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控制与引导过程中,要健全新媒体时代新闻发言人机制,一般由涉及部门的分管领导或者政治素质强、政策水平高、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来担任。网络舆情一旦发生,新闻发言人要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平台,对外公布政府态度、事实真相、政府处理进程等,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最大限度地挤压不实报道、蓄意炒作的空间。对于网民而言,新闻发言人是政府的代表,网民对他们的言论信任度较高,新闻发言人的发言质量对舆情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加大对新闻发言人工作的支持,让新闻发言人及时了解党委政府的决策,参与相关会议,确保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的准确性。同时,还要加大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学习新闻传播规律,不断提高发言人的新闻舆论知识水平,提高他们和群众、记者打交道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张嘉煜.地方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策略转变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22.
- [2]统一战线视域下引导网络代表人士在网络舆情中发挥作用研究[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5):32.
- [3]曾胜泉.网络舆情应对技巧[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 [4]王迪.突发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风险防控研究[D].长春:吉林建筑大学,2020.
- [5]陈秋芸.全媒体时代下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37(9).
- [6]孙靓梅,莫莲娣.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控制与引导研究[J].现代盐化工,2020(3).
- [7]向加吾.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角色定位与舆情引导途径研究[J].法治与社会,2017(10).

责任编辑:常海哲

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新时代 统战工作的作用和路径研究

卢传红 仰叶齐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也是统一战线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持,同时,统战工作又是传承弘扬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场域。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有效激发各阶层人士、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有效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凝聚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拓展海外统战工作,争取国际认同和合作。做好新时代大统战工作要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形成文化统一战线。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助力 统一战线 实践路径

统一战线是我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保证和特色要素。当今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在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意义尤为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支撑,也是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文化基础,做好新时代大统战工作,必须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和推动统一战线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统一战线有深度的内在关联

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灿烂独有的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家国天下”“多元一体”“兼收并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协和共生”的文化思想和统一战线工作宗旨与实践逻辑深度关联、高度契合,深刻久远地影响、规范着统一战线的发展。

(一)统一战线思想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统一战线伴随着党不断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

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百年统一战线的实践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统一战线所吸收、所融汇,使统一战线的血肉更为丰满,更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1]

1、“大一统”思想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华民族漫长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三个认同,即拥有共同的祖先;延续着共同的华夏文明,同文同语、同习同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这种文化认同与血缘、地缘归属感融合交织在一起,就自然共筑起牢固的爱国统一战线。“‘大一统’思想就是中华民族核心文化情结、核心文化精神,更是统一战线之魂”。^[2]

2、“和合”文化是统一战线形成的社会思想基础。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是指和谐、和平、中和等,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合”就是汇合、融合、联合等。“中国传统文化讲‘和合’,主要是用以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强调这些关系应该保持和谐

作者简介:卢传红,男,安徽省潜山市委党校副教授。

仰叶齐,男,安徽省潜山市委党校副教授。

一致,有效形成合力。”^[3]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重义轻利、厚德载物的宽容胸怀和品格,是我们民族一贯追求的文化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性格,是中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合文化在现代统一战线中占有很大成分,没有和合文化传统,统一战线思想是不存在的。”^[4]

3、“和而不同”思想是统一战线“求同存异”原则的思想理论渊源。“和而不同”出自儒家经典中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后逐渐引申为“事物都是千差万别的,差别的事物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又能够统一起来,相辅相成,同生共长。”^[4]“和而不同”就是既强调事物的同一性和一致性,又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这是看待、协调和处理“多样性”与“同一性”之间矛盾关系的重要思想依据,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心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时代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社会发展进步必不可少的保证,而统一战线就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的联合,“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的存在,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是统一战线存在的客观基础,更是统战事业发展的旺盛活力和不竭动力。”^[2]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仍然对今天的统战工作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深刻借鉴启示。

1、以文化认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统战工作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核心工作目标,巩固提升统战对象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5]而文化的核心功能是塑造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华夏儿女共同的文化基因、精神依托,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核基础,通过弘扬中华文化,可以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思想和精神,就能协调好各阶层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整合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社会力量,凝聚人心,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发挥积极作用。

2、“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大团结大联合,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能够实现大联合大团结的统一战线,传统文化在其中起着深层的规约性、根源性作用。中华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在尊重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更强调“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促进不同主体“协和共生”。正是秉持了这种“协和共生”的理念,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建设发展实践中,确立了以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相互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创立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可以说文化本身就是凝心聚力、团结联合的基础。

(三)统战工作是传承弘扬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场域

统战工作不仅体现中华文化的基因、吸收传统文化的营养,同时,也有着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强劲动能。很多地方统战工作部门在实践中积极利用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饮食、服饰等传统文化元素,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增强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有些通过“民族民间技艺培训”“传统国学论坛”“中华读书社”等常态化活动,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组织空间和平台,满足他们自我表达、自我提升等需求,发挥了优秀传统文化凝心聚力的功能作用。还有一些地方统战工作部门探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公益、智能时代、文创产业、互联网空间等时代议题结合,赋予传统文化时代性、科技性元素,使其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发展,^[6]更好地发挥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精神纽带。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推进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源头,为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

精神支持,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时代统战工作开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

(一)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激发各阶层人士、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

我国几千年历史上,多有战乱、动荡和分裂,比如春秋战国、南北两朝、五代十国等。但无论如何,中华民族最终选择的还是“大一统”。这种“大一统”思想长期的影响,使爱国主义成为民族精神,追求统一、反对分裂、民族融合、天下一统、共同发展成为中华历史的主流形态。正是“大一统”思想发挥了重要的维系作用,中国五千多年历史,统一多于分裂,分裂必然走向统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香港、澳门也顺利实现回归祖国怀抱,新时代新征程上更要继续大力宣传和弘扬“大一统”思想和“一国两制”方针,团结汇集海峡两岸和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爱国力量,促成台湾早日和平回归,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二)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实现统战工作有效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各界的和谐

“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是一家一派的主张,而是诸子百家的共识。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和合”文化不断得以充实和丰富,逐渐形成了以“天人合一”“贵和尚中”“兼收并蓄”“修身正心”“协和万邦”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这一东方哲学智慧既体现了我华夏先人对自然的尊重、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追求,这对促进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维系社会稳定、推动各民族相互融合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价值启示。和合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历史智慧,常用常新。借鉴“和合”文化,有利于统一战线更具民族特色和丰富多彩的内涵,从而也为海内外更多的人所接受,更能增强社会认同感和亲切感,有助于正确处理异同关系,达成思想文化共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自觉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

(三)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思想,做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把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

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责任,做好这项工作,既要固守爱国这个最大同心圆,又要积极扩大共识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这就需要尊重现实社会各种“不同”,保持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鲜明个性,同时通过细致真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共同理想的感召、共同目标的激励、共同利益的维系,有效地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实现“求同存异”,进而达到“聚同化异”,从而保持政治信念、发展目标的高度一致,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

(四)通过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传播,拓展海外统战工作,争取更多国际认同和合作

中华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深厚软实力,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资源。在文化交流碰撞日趋频繁,文化霸权主义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传播,^[6]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我国和平发展的声音,让海外华人和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了解中华优秀文化内核及其蕴含的精气神、价值观,可以提升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影响力、传播力,巩固和提升海外华人尤其是新生代海外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最大限度把海外侨胞凝聚起来、汇聚起来,与祖国建立和增强合作与交流,参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入民族复兴伟业。同时还能够提升我国的国际和平形象,争取更多国际认同和合作,更好造福中国和世界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实践路径

随着时代发展进步,我国社会正在加快转型,个体化、分层化日趋突出,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自我意识普遍增强。不同的阶层、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统战工作客观上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更为艰巨的任务。如何兼顾各方利益,求同存异,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是新时期统一战线面临的重要课题,要破解这个课题还必须从文化深层入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软实力,助力推进新时代的统战工作。

(一)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形成文化统一战线

1、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与筛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体现了全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蕴含着化育人心,整合团结力量,培育文化自信的磅礴伟力,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适用于统战工作,需要我们对历史文化中的统战资源加以挖掘和筛选,激活蕴含其中的统战基因,“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促进统战历史文化‘活’在当下、服务当代,为新时代统战工作不断注入新动能。”^[7]

2、探索做好文化统战工作。以统战工作“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为抓手,创设“同心书屋”“同心微剧场”,开辟统战文化专栏,推出一批统战文化题材的文艺作品;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的联系沟通,充分发挥其作用,筹划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挖掘传统“好文化”、讲好统战“好故事”、传播中华“好声音”。

3、加快推进统战文化基地建设。以地域特色为基础,充分发挥文化在统战工作中联人、联谊、联心的独特作用,推动建设一批“宣统战战思想、展示统战文化、凝聚统战力量”的平台基地,激发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情感共鸣,凝聚形成思想政治共识。

(二)加快建构统战话语体系,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以文化助力统战工作,宣传话语体系就至关重要。不能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剪裁中国实际、说明中国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论统一战线,多是从高深的政治词汇中走出来,结合人们熟知的历史典故、老百姓的生活实际,贴近时代发展潮流,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清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以及“怎样巩固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等重大问题,这是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典范。当前,要加快构建统战工作的话语体系,取得话语权,用中国话语标准讲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1、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的活力在于创新,文化资源的运用和发展仅

靠继承、学习和照本宣科是不够的,必须与时俱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全球化场景、互联网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服务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时代任务,深化海内外中华儿女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积极运用新媒体,创新文化传播方式。时代的发展,受众的变化对文化的传播形式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主动改变传播策略,积极运用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占据舆论主阵地,多渠道扩宽统一战线文化传播的路径,将中华文化中的精华以数字化、年轻化、趣味化的形式进行传播和引导,紧贴时代步伐,不断进行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变革,保证传播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三)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积极培育统战文化

统战工作的本质就是解决人心和力量的问题,首要的是获得人心,只有人心齐才能力量大、“泰山移”。“人心获得实质就是认同归属,而认同最终的归依应基于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8] 坚定文化自信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础。

1、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并不是一句口号、一个理论名词,它是可以培育和践行的。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清楚地了解华夏民族文化的历史来源、价值体现,理性客观的分析民族文化的性质、特征,客观的评价民族文化的优劣态势,根据当前时代发展需求,批判继承本民族的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发展,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同时,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声音,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2、积极培育新时代统一战线文化。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积极培育新时代统一战线文化。不断夯实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切实加强多党合作文化建设;大力倡导和合文化,引导阶层关系和谐发展,助推各阶层共担社会责任、共享发展成果;坚持各民族文化交融浸润助推民族团结;正确引导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搭建海内外联谊联络平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内外的交流合作,助推海内外互动融合。以更精准有效的统战文化赋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

参考文献

- [1] 宋云高.中华和合文化与爱国统一战线[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03):42-45.
- [2] 仪平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推进“中国特色”统战工作[EB/OL].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官网 <https://tzb.upc.edu.cn/2021/0930/c18204a347233/page.htm>[2021-09-30][2024-08-06].
- [3] 杜玉娟,马巧丽.传统和合思想与爱国统一战线研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02):158-161.
- [4] 黄铸.中国统一战线和而不同的历史传统[EB/OL].人民网-《人民论坛》[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68846-245094.html)68846-245094.html[2009-07-23][2024-08-06].
- [5] 李艳霞.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统战工作的双向赋能[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07):103-111.
- [6] 赵泽琳.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脉络是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根基[N].中国新闻报,2022-10-12(A07).
- [7] 白竺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助力新时代统战工作发展[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22(02):34-38.
- [8] 张颖.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与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工作[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01):21-25.

责任编辑:常海哲

(上接第13页)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507.
- [7]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求是,2023(20).
- [8][16][17][2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9] 习近平著作选读[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3.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52页.
- [1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12-27(02).
- [1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02版).
- [1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02版).
- [1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4:39.
- [15] 毛泽东文集[M].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9.
- [18]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411页.
- [19]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24年1月1日.
- [20] 刘同舫.《在传承与发展中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人民日报》,2023年8月31日(11).
- [22][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508、535-536.

责任编辑:张凤玲

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 意义、现实困境和破解路径

赵雪芬

【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不断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本文以廊坊市统战成员服务乡村振兴为例,从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现状、困境进行探索思考,并提出解决进路。

【关键字】统一战线 服务 乡村振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优良传统的应有之义,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为了深入了解目前统战工作服务乡村振兴的现状,笔者以廊坊市为调研对象,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在分析廊坊市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已有成绩和短板的基础上,提出了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一些建议。

一、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意义

(一)服务乡村振兴是统一战线服务中心大局的重要内容

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作为农业大市,廊坊市各级统战部门应继承和发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优良传统,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实际行动服务乡村振兴这一重大历史任务。

(二)服务乡村振兴有利于优化统一战线内部关系

统一战线具有广泛性、进步性、复杂性的特征,内部成员因为思想观念、经济利益、生活方式的不同具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可以把统一战线不同成员的利益协调起来,可以化解内部矛盾冲突、优化内部关系,使统一战线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战斗力和创造力。统一战线成员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遵循党委出题、统战服务的工作思路,采取人才下乡、智力帮扶、结对共建、建言献策等措施来帮助解决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这对于统一战线成员增进共识、开拓视野,协调关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服务乡村振兴是实现统一战线核心理念的有效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目的就是要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加强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大联合,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领导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正是统一战线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家中心工作,凝心聚力,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具体体现,也是在乡村大地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在

作者简介:赵雪芬,女,汉族,廊坊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

农村画出最大同心圆的过程。

二、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做法——以廊坊市为例

近年来,统一战线积极深度参与乡村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创新理论和创新实践,开启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局面。在廊坊市,统一战线积极助力乡村振兴,形成了一系列创新实践成果,为廊坊市的乡村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挥政治优势凝聚共识,助力乡村振兴

廊坊市统战部门充分发挥其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优势,为乡村振兴广泛凝聚共识。

一是强化思想引领。在全市统一战线中广泛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和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的学习,通过集中学习、专题辅导、谈心谈话、交流研讨等途径,引导民主党派、无党派、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等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增强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提高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增强了服务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二是高位谋划推动。廊坊市委统战部制定了《廊坊市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廊坊市统一战线参与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任组长,定期研究推进,将廊坊乡村振兴中重点、难点问题及时反映到有关部门,通过顶层设计和建言献策来解决廊坊农村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领导小组下设10个小组分别对应10个乡村振兴示范区开展联络工作,通过多层次、多方面的联动,保障乡村振兴的高质量推进。

三是完善体制机制。对廊坊市10个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情况进行综合研判,建立“部领导包示范区、统战科级干部包联乡镇”的工作机制,落实了市、县、乡三级联络员,选派熟悉农业生产、乡村规划、乡村旅游的干部挂职示范区,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统筹联动的工作格局,建立起了集中统一领导、责任分工清晰、上下统筹联动的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运行机制。

(二)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发力,助推乡村振兴

廊坊市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资金密集、技术集中、人才荟萃的资源优势,助推乡村振兴。

一是智力扶村。统一战线素有“智囊团”的美誉,

统一战线内部有许多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廊坊市按照“内挖潜力”和“外部借力”双向推进模式,县级层面和乡镇层面均指定专人摸清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各个领域的统战成员底数,掌握成员的基本情况,把对乡村振兴有帮助的人才纳入乡村振兴人才库进行统筹管理。目前,各县(市、区)均建立了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人才数据库,为乡村振兴工作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永清县委统战部,为了提升番茄品质,聘请中国农业大学党外专家团队,推出“番茄一号”新品种,提升了番茄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如廊坊市委统战部定期统筹协调各民主党派中长期从事农业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技术人员到固安、永清等地开展技术下乡、科普送教等活动。

二是产业联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先手棋,下好先手棋,乡村振兴这盘大棋才会走活。统战部门引导民营企业结对帮扶村街,探索出了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投入乡村振兴的新途径。据统计,自“万企兴万村”实行以来,霸州市引导262家民营企业参与建设项目352个,投资约13.5亿。安次区引导389家民营企业与189个村结对帮扶,有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增加群众就业。三河市支持401家民营企业帮扶266个村街,落实599个兴村项目,投资总额超3.7亿元,

三是公益帮村。利用廊坊大讲堂、廊坊统战公众号等平台,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开展送医、送科技、送技术、送法律等社会服务。民革、民盟、民进廊坊市委分别在打造多位一体文旅融合集群、非遗项目帮扶孤残学生方面发挥能量,推动乡村文化教育发展;民建廊坊市委发挥经济界人士优势,助力村街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农工党廊坊市委、九三学社廊坊市委分别发挥医药卫生和科学技术人才特长,为基层卫生院、农业科技园区输送技术、传授技能。

三、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的短板

廊坊统战部门解放思想、创新举措,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但在调研走访中发现,当前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还有很多短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统战部门工作千头万绪,影响振兴效果。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现实生活中,统战部门干部要负责多项工作,乡村振兴仅仅是其诸多中心工作之一。统战部门有服务乡村振兴的主观愿望,可是因为工作繁冗、自身能力有限,导致服务乡村振兴的举措不实、方法不活、效果不好。

二是基层统一战线力量薄弱。统一战线助推乡村振兴需要基层统战组织作为桥梁和支撑。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各项任务指标经过逐层分解,最终的责任部门是基层统战组织。真可谓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调研发现,当前基层党组织统战力量较弱,统战部门的组织机构一般只到乡镇,村级党组织的统战人员流动性较大,人员配备不足,工作积极性不高,业务能力不强。

三是统一战线运动式振兴不同程度存在。统一战线普遍存在运动式参与现象,振兴效果在短期内确实明显。运动式参与振兴会带来振兴工作的长效性不足、振兴中存在“一刀切现象”、振兴供需不匹配、振兴工作与农村实际脱节、盲目追求政绩而出现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

四是乡村振兴村民主体地位缺失。目前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主要形式是“万企帮万村”的公益性帮扶,没有培养带动农民的经营能力,造成对口帮扶结束后农户返贫、农产品滞销。部分农民对乡村振兴的认识不够深刻,甚至存在着排斥和抵触情绪,“等靠要”思想严重;部分农民虽然认识到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但是不愿付出代价,力图“搭便车”享受乡村振兴的福利。村民主体地位的缺失,出现了“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

四、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

(一)统一思想共识,聚拢振兴乡村的统战成员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统战成员主体意识。强化统一战线成员统战理论知识和“三农”知识教育培训,教育引导全面理解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工作要求,明确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角色定位,端正服务态度、摆正心态,形成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强大共识,增强广大统战人员对振兴乡村、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想认同、情感

认同和行动认同。只有目标一致、追求相同,在前进的道路上才会更有信念,更有动力,面对新形势下的各种风险挑战,才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攻坚克难。

二是汇聚力量服务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工作,需要多方协作、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统一战线是汇聚各方力量、协调各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抓手。统一战线人才众多、智力密集,其最大优势就是能把大批党外人才有效组织起来,鼓励各领域各阶层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乡村振兴,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统一战线可以整合民主党派、乡贤、新的社会阶层等统战力量,共同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细化落实,齐心协力打好乡村振兴这场硬仗,在乡村大地上画出最大同心圆。

三是找准统战工作服务乡村振兴的切入点。统一战线突出界别特色,找准服务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就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一号文件的“两个确保、三个提升、两个强化”的目标任务展开服务。通过深入乡村调查研究,统一战线内部各成员结合乡村实际、农民意愿,找准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契合点,拓宽统一战线参与乡村振兴的广度和深度。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避免出现“政府干、农民看”的“两张皮”现象,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二)创新方式方法,增强服务乡村振兴效果

一是实施“统战+特色产业”,促进产业振兴。引导民营企业把自身企业发展融入乡村产业振兴中来,与重点村街结对帮扶,通过产业联村、项目带村等形式,实现非公企业收益、村集体受益、农民获益的“三赢”局面,让参与其中的百姓得到真真切切的实惠。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打造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二是实施“回归+培育”,促进人才振兴。积极动员和吸引乡贤回归乡村,为农村发展服务,成为乡村振兴的带头人,带领村民一起致富。鼓励农业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并为他们建功立业提供支持。统一战线成员在送知识、送技术、送法律的基础上,也要重视对农村现有人才资源的挖掘和培养,想方设法帮助农民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长久动力,实现人才振兴。

三是实施“统战+善治农村”,促进治理有效。发挥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既利用新乡贤作为基层政府和村民之间的桥梁作用来有效调节村民和政府之间关系,也充分利用新乡贤自身威望和影响力,有效调解邻里矛盾,把农村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调动社会组织的力量,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座谈交流会、协商议事会等形式,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促进乡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四是实施“文化+乡风引领”,促进乡风文明。引导统战力量中的文化界人士关注农村、关心农民,创作出更多反映乡村振兴的文艺作品。组建“宣讲团”“志愿队”送文化下乡,进村入户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和精神风貌。发挥统战成员中的文化界人士的作用,深入开展乡村文化帮扶,丰富村民文化活动,推动文明乡村形成,塑造良好社会风气。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借助数字技术扩大乡村传统文化的空间影响力,充分利用AR、VR等技术强化沉浸式体验,做好民间文化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五是实施“乡贤+环境整治”,促进环境改善。利用乡贤联谊会吸引在外廊坊籍非公有制企业家、新

阶层人士、退休老干部等乡贤投入乡村建设中。乡贤利用自身的文化知识,帮助制定环境保护的村规民约,带动村民提升环保意识,完善村庄整体规划。发挥乡贤联系广泛的优势,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探索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多元融资模式,打造农村美丽生态、美好生活。

(三)增加“人、财”投入,构建统一战线保障机制

一是配齐基层统战干部,加强统一战线人才保障工作。首先,要在数量上配齐基层统战工作人员,夯实基层统一战线工作力量。畅通晋升渠道,提高薪资待遇,增强基层统战工作人员的归属感、荣誉感,从而心甘情愿投入基层统战工作中。其次,基层统战工作人员要深入乡村调查研究,了解乡村产业、文化、治理等情况,了解群众的期盼,找准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切入点。最后,提升基层统战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基层统战干部只有不断提升理论和业务知识才能适应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

二是加大经费投入,构建统一战线的物质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涉及范围广、问题多、任务重,充足的经费保障是保证基层统一战线人员能全身心做好基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前提。增设统一战线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专项经费,用作联络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动员等费用。此外,设置激励基金,对统一战线成员投身乡村公益事业、扶贫济困、捐资助教等先进典型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责任编辑:常海哲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伟大政治创造研究

——基于党际关系比较

梁晓宇 李文迪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受宪法保障并在实践中落实,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制度机制鼓励支持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力合作。这种以平等、合作、共赢为基调的政党关系,跳出了西方政党政治的框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生态,为人类政治文明向前发展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

【关键词】政党关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民主党派

不同的政党制度产生不同的政党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关系,不同于一党制中的独裁专制,区别于多党制下的竞争制约,也非即联合又竞争的嵌合体。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具有平等地位的亲密友党,各民主党派广泛参政,与中共在合作中携手同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要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1]。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搞好自身建设,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戮力同心,目标一致,同心同向同行,创造了崭新的政党关系。

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位平等

追求平等是人类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体现。平等既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七十五载并肩共进的辉煌历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是法律平等与事实平等相统一,且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充分彰显。

(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受宪法保障

法律是实现平等的重要途径,《韩非子·有度》写道“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距今约2500年的法家思想就蕴含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思想。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也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位平等的最高法律保障。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一部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新中国建国大纲,规定新中国政权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成^[2],这就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的法律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拟定《共同纲领》的过程亦是对平等的诠释,仅在筹备会中,来自不同单位的六百多位代表进行了七次的分组讨论,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中平等地与中国共产党的拟定新中国建国大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3BKS04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晓宇,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思想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

李文迪,女,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党的建设专业2023级硕士研究生。

纲,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胡乔木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大智大勇,虚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建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3]。

1954年9月20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个宪法以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肯定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巨大作用与价值,并且“民主党派”一词首次在宪法中出现使用。这种平等的政党地位与和谐的党际关系在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重创,但“文革”结束后很快得以恢复。1978年宪法重新定义了统一战线的含义,强调“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并在第五条中规定“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即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都不能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978年宪法将受到挫折的党际关系拉回正轨。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序言,平等的党际关系再次巩固,中国政党制度上升为一项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政治制度。

(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是实质性平等

“西方式的党际关系对竞争性的强调使党际关系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平等”^[4],两党制和多党制二者间的共性是都存在在野党,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反对党,在社会体制中都拥有合法的地位和政治功能。在强调竞争性的政治环境下,在野党、反对党为了掌握政权,通过各种竞争手段与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相抗衡。一些“小党”为了赢取更多选票坐上政治利益分配的餐桌,不得不与“大党”形成政治联盟,因此就难以避免地在政府中产生主导性政党和从属性政党。这种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存在主从地位的现象在世界政党政治中屡见不鲜,例如在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两党形成了“强弱组合”的联

盟格局,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在其中占据着主导优势,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受限于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组织实力,在联盟中处于从属性地位^[5]。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关系与上述情况存在本质差异。首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即共同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者的团结合作立足于共同政治追求。拥有共同的政治追求就意味着,无论各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有何不同,他们与中国共产党都是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复兴事业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其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友党的关系经历了革命战争与改革发展的试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历史的检验中确立与巩固,民主党派在大团结、大联合的旗帜下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参政党。因此从本质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区别于西方政党制度下的在野党、反对党,执政党与参政党是基于共同信念、共同价值的亲密友党,参政党能够在宪法与法律制度安排中参与中央和地方政治决策。

而西方在野党、反对党由于与执政党存在竞争关系,可以通过操作国会、议会打压执政党的政策和行动,政策的决策与执行效率低下是最容易产生的后果。以韩国梨泰院踩踏事件为例。该事件发生一年半之后,韩国国会才于2024年5月2日表决通过《梨泰院特别法》,要求对该事故进行彻底调查。踩踏事件发生之后,行政安全长官李祥敏逃避问题,躲避发言,不敢正视灾难应对中的不足和问题,进一步激化了国民的不满。在灾难应对的具体过程中,执政团体没有担负起应有的责任,没有第一时间确定事件原因及相关责任人,没有及时启动应对机制和安抚国民情绪,而是把事件的调查扭曲为党派之间互相攻击的政治斗争。梨泰院踩踏事件反映出了韩国警方和地方政府配合不足问题,同时也深刻说明了加强不同党派协作对话与合作机制的极端必要性。

(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在实践中彰显

“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以检验人的认识是否为真理”^[6],人类的认识是通过人与世界的实践活动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也是检验认

识的标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救国会宣布解散,有一些民主党派也认为自身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而酝酿解散。中国共产党认识并重视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发挥的重要性,主动协助民主党派巩固组织发展成员。民革、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个组织合并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中共的工作下,从1950年至1953年初,各民主党派成员总数从不足一万一千余人发展到三万两千余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各民主阶派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转变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就出现了认为“民主党派是包袱”,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这样的错误思想。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相互监督”^[7],这纠正了党内部分同志居功自傲的错误思想,提高全党对统一战线的认识,也鼓舞了各民主党派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决心。十八大以来,多党合作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协作、合作共赢的平等关系体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参与政治活动。民主党派成员以个体形式当选人大代表或担任人大常委会领导职务,这与西方议会制下以党派组织身份有本质差异。即我国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不受政党自身成员规模、影响力等限制,而是平等地参加国家政权。作为人大代表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通过人大这个平台,反映社情民意,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制定法律,监督政府,在行使人民代表的各项权力的同时,也履行了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重要职能。202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24位部门主要负责人在‘部长通道’、记者会上对外发声,18位代表、27位委员走上‘代表通道’或‘委员通道’讲述履职故事”^[8]。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通过各级人民政协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2012年至2020年,仅民革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的集体提案就高达301篇,在2023一年中,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交提案563件、大会发言144篇,全国政协党组成员同

党外委员开展‘一对一’谈心交流403人次,交流情况、沟通思想、增进共识,许多重要意见得到有关部门重视采纳^[9]。

二、中国共产党支持各民主党派广泛参政议政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并支持各民主党派广泛参政议政,坚持完善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制度体系,积极引导各民主党派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渠道。

(一)中国共产党坚持完善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制度机制

西方国家的参政模式围绕着选举展开,带有政治倾向的智囊机构可跟随不断更替的执政党参与到国家管理中,但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政治机构的频繁更迭难以保障国家决策的科学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选举中失势的政党成为在野党后也不能参与政权。制度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重视以制度机制的完善来保障各民主党派广泛参政议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主张和建议能够通过合法渠道进行表达。

在参政议政的内容上,198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参政的要遵循的“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基本点,即“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10]。1989年《意见》对民主党派在什么问题上参政,在什么层面上参政,以什么方式、途径参政进行了详细的界定,为民主党派更好履行职能,发挥参政党作用提供了政策依据。“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基本点是对参政党内涵的深入阐述和进一步明确,这一原则不仅清晰地界定了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区别,还划清了参政党与西方国家反对党、在野党的界限,有助于消除部分西方学者将中国参政党等同于“法团组织”的错误概念。进入新时代,为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促进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就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习近平介绍了中共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形成过程,他希望党外人士畅所

欲言、开诚布公,发表真知灼见,对中共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11],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意见和建议高度重视,同时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供更广阔空间。

在参政议政的形式上,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12]对政党协商的形式、程序,以及保障机制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阐明了政党协商的深刻内涵和重要地位,这对各民主党派有序政治参与、畅通意见表达渠道和凝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在参政议政的渠道上,人民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的重要渠道,2022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13]是一部专门规范政治协商工作的党内法规,《条例》提出了政治协商工作应当遵循的四项原则,进一步提高了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近年来,保障各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制度机制随时代发展不断完善,如2021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印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14]白皮书,2023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15]等,都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制度保障和机制设计等内容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安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要着眼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完善知情明政、协商反馈机制,提高政党协商质量,健全议政建言机制,有序开展民主监督”^[16]。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内部也重视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也均将参政议政的准则、途径、主要内容等写入党派章程。制度的进步需要与时代的发展相协调,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所面临的时和势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需要继续团结各民主党派,以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参政制度安排应对新机遇与新挑战。

(二)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各民主党派有序政治参与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和制度化的渠道,按照法定的组织程序有层次地影响政府决策”^[17],

而无序的政治参与如非法罢工游行、闹访缠访等,不仅阻碍了政治参与主体的合理诉求表达,也会损害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参政热情不断提高,各民主党派成员大都由中高级知识分子构成,具有较高的参与意识、高专业素养和社会影响力。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有理有据地表达意见与诉求,对广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起着示范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各民主党派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活动方式多样化发展。如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听取执政党重大政策方针情况通报座谈会、参加高层协商会、参加小范围谈心会,或以“直通车”的形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意见建议,民主党派成员“按比例组成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成员,直接参与国家权力机关运行或担任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及其相关的领导职位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同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对口联系等形式参与决策,以特约人员身份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和监督”^[18]。同时,中国共产党鼓励支持各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照顾同盟者利益。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把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作为政治责任,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抓好落实”^[19],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履行职能”^[20]。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各民主党派自觉以中共为师,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四新”“三好”要求,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三)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渠道

近年来随着以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为形式的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获取、传播和分享信息变得前所未有便捷化,信息流通的速度与广度也高效化,但与之相伴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形势和重要任务。各民主党派是将所联系群众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的“桥梁”,参政议政作为民主党

派传递民情民意的重要方式,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需要不断创新和拓宽渠道。

中国共产党重视并照顾同盟者利益,将民主党派视为自己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21]在加强政党协商方面,自中共十八大至2021年6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民主协商会、座谈会等,一共有172次,其中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有37次”^[22],通过加强政党协商,各民主党派更加积极参与到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讨论和制定中。在优化政协平台方面,自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开始,“已经形成了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23]等九个专门委员会、社会团体以及各地方政协机构,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政协中担任重要职务,通过政协提案、社情民意信息、专题协商等方式,就国家大政方针、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等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在创新参政议政形式方面,通过运用互联网、新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宽参政议政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这些新形式的参政议政渠道为民主党派提供了更多元化、更便捷的参政议政方式。如浙江省金华市政协在信息化等技术的应用基础上,探索并不断升级“民情一点通”数字化应用平台,提高了政协委员收集民情民意的效率,为各民主党派更好地联系界别群众、倾听民意开拓新路径。

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

(一)基于共同政治目标的通力合作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基于共同政治目标的通力合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共同政治主张就促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由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等于1930年创立。临委会成立的直接目的,是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继续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临委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核心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以复兴中国革命。邓演达对临委会政治纲领高度概括为“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邓

演达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邓演达的民主革命思想与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的阶段性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二者都以实现中国解放为革命目标。此外,1945年冬天,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都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而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也都表达了对和平和民主的期盼,爱国、民主、和平的共同政治目标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相守经历苦难,携手走向辉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目标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之后,各民主党派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章程,确定了新时期的新任务,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即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携手前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新时代新征程,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共同的政治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24]。

(二)基于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通力合作

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是政党间建立互信、深化合作、实现共赢的基石,它不仅有助于减少分歧,增进共识,还能促进政党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构建更为稳定和谐的政治生态。在实行多党制的法国,由于政党的数量和议员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独占议会中的绝对多数,议会中的大党为了掌权,必须和其他党派联合形成政党联盟构成多数,才能出面组阁,因此政府构成也不能由一个党决定,必须由为了利益而短暂“合作”的政党确定,这样的政府就极具不稳定性,也就是说一旦结成“合作关系”的政党之间闹矛盾,政府就会解体。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能够风雨同行、守望相助75周年,是因为二者从最初的合作就基于共同的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民主党派积极投入到新政权的建设中,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各民主党派主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这一时期爱国主

义和社会主义成为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之后,各民主党派积极主动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实践中,自觉加强思想建设,不断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这一时期,“是民主党派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道路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断夯实合作的政治基础阶段。

“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25],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共同目标。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通向幸福的必由之路,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也是多党合作的政治方向 and 目标任务。”^{[26][27]}《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列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之首,各民主党派也自觉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写入各自章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密切开展合作,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考察调研,共同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巍巍巨轮前行。

(三)一元领导与多元参与、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通力合作

在西方多党竞争的政治体系中,各政党以独立的身份参与竞争,否认彼此间存在明确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由于缺乏核心政党的领导造成决策执行混乱和偏差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国会因两党分歧而迟迟未能通过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给疫情防控和复苏带来了困难。由此可见,在政党政治中,想要有效推进多党合作并协调好各方利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具有一元领导与多元参与、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特征,这种合作模式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有利于凝聚共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一元领导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上。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勇担领导重任,“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1],党的领导为多党合作连续性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多元参与则体现在各民主党的参政议政作用上。各民主党派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这种多元参与有助于拓宽人民群众发表意见的渠道,照顾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从而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致性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形成基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一致的政治共识,即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多样性则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活动、参政方式等方面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共同思想政治为基础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其参政地位,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越发紧密,我们一定要继承好、发扬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平等协商、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优良传统,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新篇。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50.
-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J】.江西政报,1949(03):16-20.
- [3]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60-561.
- [4] 郭定平: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与效能提升路径分析【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03):92-106.
- [5] 弓联兵,秦清:欧洲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的动因与策略【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04):110-117.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2.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李蕊,王云娜,王永战,等.“两会传递的信息,让我们充满信心和力量”【N】.人民日报,2024-03-12(003).

[9]王沪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24-03-11(003).

[10]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中共二十大报告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10-14(001).

[12]中办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N】.人民日报,2015-12-11(001).

[13]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N】.人民日报,2022-06-21(001).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N】.人民日报,2021-06-26(002).

[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N】.人民日报,2023-03-19(001).

[16]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50.

[17]刘君,赵先寿: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08(04):67-70.

[18]刘钰琦: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提升策略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23.

[19]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2-02-24(001).

[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21]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J】.中国政协,2018(05):4.

[22]理论、政策、实践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硕果【EB/OL】.(2021-06-25) [2024-06-05].<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625/c437857-32140850.html>

[23]邱永文,马丽,田艳天.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05):7-12.

[24]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会摘编【N】.人民日报,2024-04-03(10).

[2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02).

[26][27]张献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24.

责任编辑:张凤玲

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不断提高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

王 凯

【摘 要】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民主党派必须依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政治把握能力,从制度自信、理想信念、责任担当三个层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民主党派应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学院作为统一战线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强化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辉实践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成就,贡献新力量,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巨大效能和明显优势。

【关键词】民主党派 政治把握能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1]这一重大决定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同时也对各民主党派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履职尽责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实践充分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国家治理本质特征,相比西方政党制度具有聚焦国家治理的比较优势^[2]。

新担当新作为必须建立在持续不断的自身能力建设基础之上。2022年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各民主党派要紧扣参政党建设的目标和原则,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用自身建设的新成效展示参政党的新面貌。”^[3]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了民主党派的“五种能力建设”,其中“政治把握能力”居于首位,是“检验民主

党派政治上成熟不成熟、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的集中体现”^[4]。作为其他四种能力的先导,政治把握能力是最根本、最基础的能力。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中,提升政治把握能力不仅是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紧迫任务,也是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选择。目前,学术界对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的研究尚显零散、模糊,缺乏深入探讨。本文旨在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历史背景,探讨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的发展方向、存在的问题以及实现路径。

一、改革新征程中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的方向目标

所谓“政治把握能力”,是指一个政党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政治局势、政治发展趋势的驾驭和判断能力,以及对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目标的定位及选择能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必须坚持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重视“心”对“身”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引用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讲的“身

基金项目:甘肃社会主义学院2024年专项课题(创新工程科研支撑项目)“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提升路径研究:基于甘肃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凯,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法学博士。

之主宰便是心”和龚自珍写下的“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并且指出“‘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5]民主党派的政治把握能力,既由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集体政治意识所决定,也是党派成员“主观世界”和“心性修为”锻造水平的集中呈现。笔者认为,改革新征程中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的方向目标由三个方面的内涵组成。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视域下的制度自信

新时代以新思想和新理论为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改革新征程中民主党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提供了方向上的根本遵循,成为鲜明的理论坐标。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两会时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6]他进而用“三个新就新在”和“三个有效避免”精辟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该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卓越政治创新。它不仅彰显了政治民主化、制度科学化与治理现代化的和谐统一,还生动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坚决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迷雾,主动塑造制度话语权,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前进。这一理论创新“通过话语共识与认同确立,增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引力’与‘张力’”^[7],为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并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视角,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在新时代,民主党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伟大创造性、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对这一制度的自信,深化政治共识,并深刻认识到这一制度与中国国情和治理需求相契合,对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具有根本性意义。提高政治把握能力的目标就是更加主动

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维护“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更加主动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更加主动地履行参政党职能,自觉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二)“两个结合”世界观与方法论中的理想信念

中共二十大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8]“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新时代通过“两个结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新强化了中华民族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使得各民主党派有了在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信,从而使政治把握能力具有强大的文化自信依托和民族精神承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发展传承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塑造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内在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同时这一制度又肩负着新的文化使命,那就是用“天下为公”“和谐共生”“求同存异”的中华智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自信是理论、制度、道路自信的基础。新时代新征程民主党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需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汲取养分,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中获得动力。政治把握能力的主要内容就是强化理想信念,摆脱低级的、庸俗的、扭曲的人生志趣,把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之中。一要赓续“天下为公”“以民为本”“集思广益”“躬行实践”

的文化基因,二要厚植“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爱国信念,三要传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为民情怀,四要将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职能作为通向“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三不朽”信仰的路径。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中的责任担当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征程须有新担当。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除了体现在思想上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也包括在行动上同向同行。

当前,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渐白热化,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中国式现代化已进入高风险高承压的关键阶段。同时,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开放面临着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阻碍。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用“六个必然要求”阐明“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内在机理,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破解一切束缚和难题的必由之路。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始终不懈为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智慧和力量,是改革开放重要的亲历者、建设者和推动者。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核心职能,是民主党派组织和成员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其要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运用人才智力优势,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发扬科学务实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提出意见建议,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水平。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以及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都应以实事求是和科学严谨的态度,针对党委政府在决策和施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预防、调整、修补等对策建议。这一过程与“改革开放”的哲学逻辑和技术路径高度一致。实践证明,一个地区发展速度的快慢和发展水平的高低除了有赖于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有效决策,民主党派作为参谋助手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而且往往能起到雪中送炭、亡羊补牢、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方位中,民主党派必须从洞察时代潮流、顾全发展大局、围绕改革中心任务方面进一步提高政治把握能力,以“心怀国之大者”的责任担当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持续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高质量对策建议。

二、现阶段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存在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民主党派能力建设问题,出台多份重要文件予以明确要求。民主党派以此为契机,大力加强“五种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履职水平。通过开展如“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等主题教育活动,持续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广泛开展政治共识教育,政治把握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建设用力不平衡,“上热下冷”现象较为普遍

从横向视角审视,相较于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在整体政治把握能力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党派开展政治教育、理论学习和组织生活的规范性、严肃性和有效性亟需提升。

从纵向看,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的思想政治建设用力不平衡,上热下冷现象较为突出和普遍。《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民主党派要“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思想建设”被置于民主党派能力建设的核心和优先。但在实际中,一些民主党派组织,特别是县、区级基层组织,存在重业务而轻学习,重形式而轻成效以及把思想政治建设边缘化、形式化甚至“娱乐化”的现象。一是基层民主党派组织每年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和组织生活会的数量十分有限。有的基层组织甚至一年没有开展过一次集中性政治理论学习。二是有的基层组织对统战部、组织部、党派上级组织举办的如民主党派骨干成员培训班、党外领导干部进修班等重视不足,多次选派重复人选来参训。三是存在以考察活动、社会服务、文娱活动代替政治理论学习,导致思想建设出现“走过场”“娱乐化”的现象。

从纵向视角审视,民主党派在中央至基层层面

的思想政治建设存在力度不均的问题,呈现出较为显著和普遍的“上热下冷”现象。

基层民主党派组织在思想政治建设方面的弱化,导致部分党派成员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定位发生偏差,容易受到西方舆论和错误思潮的影响。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妨碍了党派成员有效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能,客观上也使得民主党派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自上而下的合力。

(二)思想政治学习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待提升

在当今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正日益多元化。随着社交网络和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的方式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同时,大国之间的博弈加剧了国际制度话语权领域的激烈斗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对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的严峻挑战,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实践中,一些基层民主党派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学习的针对性、有效性不强,存在“照本宣科”“大水漫灌”“敷衍了事”等形式主义问题。有的停留在“念文件”“读报告”的“初级”层面,有的将针对一般党员领导干部的培训体系及课程不加调整而完全复制到对民主党派成员的教育培训中,忽视了民主党派成员的特殊性。政治理论学习的模块单一化(指缺乏案例式、模拟式、研讨式教学特别是缺乏指导参政议政实践方面的课程)、形式刻板化、活动随机化等问题较为普遍。这些问题削弱了基层党派组织的政治把握能力和凝聚力,导致基层党派成员政党意识淡化、政治意识薄弱、政治理论匮乏。个别党派成员加入参政党若干年却依然不知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内容,不清楚参政党的基本职能和本党派的宗旨、纲领、历史沿革等,从来没有报送社情民意信息,没有参与过调研和提案写作工作。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基层统战部指导监督不力以及基层党派领导班子对开展思想政治建设的主动性、创造性、严肃性不足,缺乏干事创业的思路和办法。

(三)组织发展工作的政治性、规范性、严肃性不够

组织发展工作是政党的基础性工作,是民主党派实现平稳“政治交接”,保证中国新型政党在坚持、发展中不断完善、优化的前提。中共十八大以来,各级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建设得到显著增强。但同时看

到,一些基层组织对组织发展工作重视不够,在发展吸纳新成员时政治把关不严,单方面注重发展对象的职务职称、行业地位和专业技能,而疏于对其政治立场、思想觉悟、道德素养等考察,组织发展工作缺乏严肃性、严谨性。

有的基层民主党派领导政治敏感性和风险意识淡薄,为急于完成发展指标,没有严格对标发展条件,致使一些政治意识淡薄、政治观念偏激甚至动机不纯的人加入民主党派。其中有的人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识模糊;有的人崇拜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加入党派后对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持有很大的“意见”,主观上拒绝参加理论学习和组织生活;有的人功利意识很强,将民主党派视作有利可图的“朋友圈”“关系网”,或是为了事业上的晋升提拔而投机性地加入民主党派;有的人对加入民主党派感到“后悔”,认为自己本是一个“隐士”“高人”,现在却要“参与政治”,对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很大的“惰性”。将这些存在不同程度“思想问题”的知识分子纳入统一战线加以教育引导固然有一定的必要性和价值,但也客观上削弱了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亲密友党的统战纽带作用和界别代表性,从源头上削弱了民主党派的政治把握能力,并且弱化了组织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提升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的路径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1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以下重要改革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守正创新、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全面依法治国以及系统观念。因此,必须不断提升民主党派的政治把握能力,且将之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系统性任务常抓不懈。

(一)“以党为师”狠抓思想建设,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党要走在时代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指导;一个领导干部要做好本职工作,一刻也离不开理论学习。”^[11]这一原则同样

适用于民主党派。政治立场的坚定性源自于理论认识的明晰,而政治意识的每一次提升,都离不开理论学习的持续积累。理论就是学问,“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12]深化政治理论学习,是提升民主党派政治把握力、巩固思想政治根基的主要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史,实际上是一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历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方法。民主党派应当“以党为师”,虚心学习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领域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3]这一论述为民主党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首先,民主党派应全面吸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理论学习方面的制度与实践经验,运用创新思维来完善思想政治建设的体系与机制。应努力向学习型 and 实干型政党的标准迈进,特别要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建设,并深化对参政党基层建设的调查研究与制度创新;其次,应推动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与机制化,借鉴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方面的成功经验。在确保必要的学习强度的同时,应在政治理论学习的“有形、有感、有效”方面下功夫,探索社会服务与理论学习的结合机制,营造一个充满活力、团结奋进、积极主动学习的政党氛围。同时,注重利用互联网、新媒体、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来提升学习的效能;第三,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史这“五史”的教育,将其与各民主党派自身的历史相结合。总的来说,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学思用的贯通、知信行的统一,以达到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的目标。通过这样的学习,引导党派成员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终能够坚定不移地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并肩作战、共同奋斗。

(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

民主党派的主体成员是中高级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紧抓不放,并且要落到实处。教育培训必须针对他们的特点量身定制,否则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针对民主党派的特殊思政课更要注重将“学理讲深、道理讲透、形式讲活”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

近年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深入探索统一战线教育培训新机制,基于“大统战”“大文化”双重视野,开展以“五史合一”为引领的模块化教学改革,推进共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有效提升了全国社院系统的整体教培水平。各级统战部门和民主党派应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以及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的主要阵地,借助社院平台,提高思想政治建设的成效。

各级社会主义学院需进一步强化教学和科研能力,同时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应以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化教育培训体系和机制的改革。一是要直面统战教育培训的痛点、堵点、难点,提高“用学术讲政治”的教学能力。“建立起一种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良性互动机制,让政治话语不是纯意识形态式的简单解释与灌输,而是更好地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以更为彻底的理论说服人、打动人 and 武装人”^[14];二是创新教学形式。在专题教学课基础上,积极探索案例式、情景式、研讨式、访谈式、模拟式和实践教学等多样化教学形式;三是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共识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去挖掘、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5]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和谐共生”“大一统”“家国情怀”等精神理念,以文化自信增强民主党派成员的制度自信,激发其参政议政的使命感和成就感。

(三)为思想政治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和纪律保障

组织领导能力是民主党派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支持社会建设中所具有的最大限度发现、组织、调动和协调政党内外智力资源和社会力量的能力,是五种能力的关键。民主党派特别是基层组织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水平,强化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服务能力,重点是加强基层民主党派组织的凝聚力和执行力。一要重视组织发展工作,切实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考察发展新成员,强化政治立场考察,严格落实标准,特别是把参政议政意愿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发展新成员时在“全才”与“专才”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二是善于培养人才,对政治立场坚定,参政议政意愿强烈、调查研究能力突出的党派成员要加大培养力度,多为其提供参政实践锻炼平台和培训学习机会;三是创新激励机制,推动党派成员“争先建言”。制定落实参政建言信息工作的积分、评比、通报和奖惩制度。将参政议政和社情民意信息报送情况作为选拔使用党外人才的核心参考标准。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相比中共,民主党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的创新性、规划性、主动性相对薄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主党派要有“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为民主党派开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指明了方向。各级统战部、组织部和民主党派应建立有效沟通协调机制,在提拔使用党外干部时要严格政治标准和政治纪律。民主党派要建立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党派成员的纪律约束。党派组织负责人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及时发现思想纪律作风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党派内部存在的不正之风,如奢靡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等及时进行纠正。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下,必须多措并举,切实增强民主党派的政治把握能力。民主党派成员应持续接受中共创新理论的教育和引导,形成改革的共识,并将思想和行动与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保持一致。在深化全面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

征程中,民主党派应展现新的责任感,实现新的成就,贡献新的力量,从而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巨大效能和明显优势。

参考文献

- [1][10]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4-07-22(001).
- [2]王凯,黄日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本质特征和比较优势【J】.党政研究,2024(02).
- [3]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22-1-30(001).
- [4]邵鸿.提高人民政协政治把握能力【EB/OL】.人民政协网,2019-5-13.<https://www.rmzxb.com.cn/c/2019-05-13/2343539.shtml>.
- [5]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03(002).
- [6]本报评论员.巩固发扬新型政党制度优势【N】.光明日报,2018-03-07(001).
- [7]冯玉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7-5(2927).
- [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 [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知,2023(09):4-7.
- [11]程春梅 马莉.领导干部要把理论学习落到实处【EB/OL】.人民网,2014-9-30.<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930/c40531-25767549.html>, 2024-8-30.
- [12]宫玉振.读书与领导力【N】.文摘报,2022-7-6(7).
- [13]学好“四史”,永葆初心、永担使命【J】.理论导报,2021(06):16.
- [14]付小红.促进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良性互动【N】.学习时报,2018-3-28(2).
- [15]许先春.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J】.理论导报,2023(09):57+61.

责任编辑:张凤玲

孔子民族观的理解维度与现实应用

陈佳敏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了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线,并且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了“两个结合”。在古代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孔子的民族观更是历代民族思想的重要源头,因此,进一步探讨孔子民族观对于民族学学科建设和民族工作领域的“两个结合”具有重要意义。孔子民族观的内涵包括“明华夷之辨”和“立夷夏之防”,“重夏轻夷”和“尊王攘夷”,“用夏变夷”和“修文德以来之”。正确理解其民族思想要立足于政治性、客观性和对抗性三个维度,运用好孔子的民族观必须从当下中国民族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关键词】孔子民族观 夷狄 华夏 三重维度 两个结合

在周朝至今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中,儒家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因此,深入研究孔子的思想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民族学领域,中国从近代开始就长期引进西方和苏联的民族学理论进行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尤其大量借鉴了苏联的民族工作方法。无论是引进的民族学理论还是民族工作方法,都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国情。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工作不断开展,民族学中国化的迫切性也不断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重要性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为民族学理论中国化指明了方向。

一、学术界关于孔子民族观的讨论

近几十年来,很多学者都对孔子的民族观进行过总结和分析。张践较早提出了孔子的民族观:一是“明华夷之辨”和“立夷夏之防”,二是“重夏轻夷”和“尊王攘夷”,三是“用夏变夷”和“修文德以来之”^[2]。这三条观点基本上归纳总结了孔子民族观的主要内

容,其他学者或基本认同以上观点,或对其加以挖掘阐释。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發,普遍认为孔子的民族观一定程度上具有进步性。王柯在《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一文中提出:古代中国的民族思想注重的是一种文明方式,因此,民族属性就被视为是可以改变的。^[3]杨翰卿在《先秦儒学“华夷之辨”再思考》中认为:孔子的夷夏观念以“礼”作判断依据,虽然承认华夷在精神文化上有差异,但尊重并试图改善精神文化上华夷差异是一种平等思想意识,并且“礼”分“华”“夷”表现出了文化宽容精神。^[4]岳焕宽在《浅谈孔子的民族观》中指出:孔子的民族观具有民族平等的内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的儒家学者在其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的民族观,对中华民族始终朝着大一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5]欧阳辉纯在《论孔子民族观的历史地位》中同样认为:孔子的民族观具有平等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6]陈慧萍、何波在《论孔子的夷狄教化观》中认为:孔子把华和夷一起置于社会体系之中,主张有教无类,通过周礼教化夷狄,实现孔子的社会理想。^[7]董强在《孔子民族观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一文中认为:孔子民族观的进步性表现为其中蕴含着民族平等、看重民族意识和强调民族大义的内容。^[8]陈玉屏在《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和历代王朝民族政策遵

作者简介:陈佳敏,女,中共天水市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部助教,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硕士毕业生。

循的基本原则》中提出:儒家以“文化”而不是血统区分民族,是抓住了“民族”的本质,另外,儒家还认为夷狄是会进步的。^[9]

另外,与以上观点的思考路径不同,朱圣明在《现实与思想:再论春秋“华夷之辨”》一文中提出了以往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在对春秋时期包括孔子民族观在内的“华夷之辨”的研究中,“以思想观念中的华夷之辨涵盖现实中的华夷之辨、以长时段的宏观的华夷之辨涵盖短时段微观的华夷之辨”^[10]。也就是没有真正还原春秋时期诸夏和夷狄的客观状况。

总体而言,学者们基本认同孔子民族观主要包含“华夷之辨”“立夷夏之防”“重夏轻夷”“尊王攘夷”“用夏变夷”和“修文德以来之”等内容,有些学者即使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观点,也只是对如何认识和深化孔子民族观的一种补充说明。基于此,笔者整理出了理解孔子民族观的三重维度。

二、理解孔子民族观的三重维度

虽然学者们通过研究《论语》中孔子关于诸夏与周边族群的论述,并结合《史记·孔子世家》《春秋》等史籍总结出了孔子的民族观,但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民族”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专业术语最早是由梁启超从日本引进并进行使用的,其西方民族学内涵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民族一词在我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现在意义上的民族一词是梁启超最早使用的)。因此,我们分析当今学术界所谓的“孔子的民族观”时,不仅要还原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还要将表现其思想的文字还原于古籍记载下的原始语境,而并不能将身处现代的我们所认为的“孔子民族观”抽离出来,以现代的民族学方法加以分析。

(一)政治性维度

在关于孔子言行的史料中,涉及孔子民族观即孔子对“华”和“夷”的论述,其实占比并不多。汇集孔子言行的《论语》约有四处描写孔子提及与华夏族相对应的“夷”或“夷狄”。《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强调夷狄即使有国君却还是没有文化,不如诸夏即使在没有国君的情况下仍保有先进的文化。《论语·泰伯》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表现出孔子对自己所掌握的礼乐文化的高度

自信。《论语·子路》记载:“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孔子强调,类似于“恭”“敬”“忠”这些礼乐文化所要求人达到的优秀品质即使到了夷狄那种野蛮落后并且缺乏外在约束的地方也不能抛弃。《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强调符合周礼的言行无论在中原还是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都通行。另外,《论语》中被孔子三次评价过的管仲因“尊王攘夷”而使得诸夏避免沦为“披发左衽”,也成为了学者们探讨孔子民族观的佐证。

综上材料,孔子的民族观是孔子用以阐明其“仁”“礼”思想的衍生物,孔子提及“夷”“狄”时,并没有把他们作为讨论的主体和焦点。相反的,“夷”“狄”只是用来反衬诸夏的,夷狄文化落后的状态恰恰反衬出华夏文化的先进性。纵观《史记》的记载,孔子无论是出仕为官、整理古籍还是兴办私学,他都是在中原诸侯国进行的,并没有采取过任何教化夷狄或者完善夷礼的行为。因此,当我们探讨孔子的民族观时,应该将其置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加以研究,即要明确孔子的民族观是学者们从孔子的“仁”“礼”思想中所剥离出来的,并且无法独立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孔子的“仁”“礼”思想,又是出于维护周朝统治的政治目的。因此,孔子的民族观是政治性的民族思想,我们不能仅从文化角度去片面理解。

这一点在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尤为明显。孔子反对管仲改革,认为这是破坏周礼,但是对于管仲尊王攘夷、抵御夷狄入侵的功绩,孔子大加赞赏,认为如果华夏变成了夷狄而“披发左衽”,也是一种丧失周礼的结果。也就是说,孔子所倡导的“仁”“礼”都只是用来维护周朝政治统治的手段而已,即使是违背周礼的行为,只要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周朝统治,那就是被孔子允许甚至认同的。

(二)客观性维度

孔子民族观具有一定理想性,这种理想性首先是因为孔子思想具有主观性,其次是被后世解读之后又增加了一层主观性,因此现在所谓的孔子民族观并不能完全描述当时客观的民族情况。正如朱圣明所指出的,学界通常把孔子所表述的个人观点作为春秋时期华和夷的真实状况,这必然会存在偏差。

首先,孔子认为夷狄和诸夏之间的区别为是否有

“礼”,这一观点本身就比较片面。孔子推崇的周礼虽然涵盖的内容很多,但仍不足以覆盖当时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民族学对于民族的定义来看,区分不同民族的要素还包括地域、语言、经济、心理等等,文化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譬如在少数民族混居或者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居的地方,不同民族往往有相似的文化,但在民族划分时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孔子提出华夷之别在于礼,只是一种为了凸显周礼重要性的话术而已。

其次,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认为,孔子修编《春秋》时所采用的春秋笔法意在表达,如果华夏采用了夷礼就会被视为夷,而夷如果到了中原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就会变成华夏。韩愈所理解的孔子民族观是否为孔子的本意这里不做讨论,但是相较于《论语》所记录的孔子言行,在夷狄教化方面,韩愈比孔子多提出了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即夷狄必须到了中原以后才能接受教化。这启发我们,在理解夷狄和华夏之间的转化时,礼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但它只是结果而已,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地理条件。比如,作为汉族重要来源的夏商周三族并非起源于中原,但当他们相继到来后,就先后发明并继承了农耕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农耕文明。尤其是孔子所推崇的周礼,它其实来源于商礼,并且在创制之初仍旧落后于商礼,经过周公完善之后周礼才发扬光大。因此,同样地,夷狄到了中原地区后,由于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适合农耕,无论他们是否受到周围华夏文化的影响,他们必然最终会从事生产效率更高的农耕生产,并且会逐渐习得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礼乐文化。因此,夷狄转化成华夏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礼可以作为其中的一种条件,但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等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三)排斥性维度

学者们对孔子的民族观基本持推崇的态度,原因是其中的“用夏变夷”“修文德以来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思想。

从孔子的“仁”“礼”思想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关于夷狄的论述或观点是用于反衬周礼的重要性的。作为周朝权力的拥护者,孔子不仅反对诸侯国颠覆周礼的言行,而且更排斥诸夏周边民族对诸侯国和周王室的入侵。在孔子对管仲的态度中可以看出,

身处春秋时期的孔子所反对的各种现象中,夷狄入侵中原无疑位列第一,即“尊王攘夷”是重中之重。由于孔子对“有教无类”教育精神的首倡和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心目中所固化的孔子“温良恭俭让”形象的影响,学者们在论述孔子民族观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扩大其中民族平等、文明教化的成分。但正如刘汉俊所认为的:“孔子思想中彰显的是刚健精神而不是懦弱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征伐连年不绝,崇文尚武风气盛行,北方民族频频侵扰周王朝和诸侯,因此,“尊王攘夷”既是一种现实需求,也是非常严肃和残酷的。因此在孔子的民族观中,“明华夷之辩”和“立夷夏之防”的这种民族对抗心理,占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

三、用孔子民族观滋养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做好中国民族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结合”,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思想,孔子的民族观也是历代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的思想源泉,因此,古今中国的民族关系都可以从孔子的民族观中找到或多或少的研究依据。另外,孔子的民族观存在一些积极合理的因素,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都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

(一)孔子民族观孕育出古代中国的民族平等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和列宁的民族平等观。但事实上这是近现代学科体系建设的结果,我们的民族平等思想也有自身的历史文化渊源,否则舶来的理论也会水土不服。上溯春秋时期,孔子的民族观就包含了古代中国民族平等思想的萌芽状态,孔子提出的“用夏变夷”和“修文德以来之”都认为夷狄能够通过学习文化变为华夏,也就是实现民族平等。

但“修文德以来之”毕竟并非等同于民族平等,只是其萌芽状态而已,因此还要辨析其中的不合理因素。首先,在孔子看来,因为夷狄文化落后,所以夷狄就与华夏不平等。这种观点固然产生于当时夷狄文化过于落后的客观事实,但对于今天的民族关系则完全不适用了。古代中国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以游牧业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生产效率更低,不仅时常入侵和掠夺中原地区,文化也较为落后。同时,掌

握中央政权的民族会采取各种手段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更加剧了民族的不平等。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各民族生产力水平都极大提高,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因此,民族关系也发生了本质改变,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是天然的平等,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等的全方面平等,而不再是需要通过后天习得才能实现的平等了。

(二)孔子以文化区分民族是古代中国的创举

孔子对先进和发达的文化推崇备至,因此,其民族观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大贡献是提供了以文化区分族群的思想源泉。沿着这一思想脉络,中国各民族留下了一条与西方民族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相较于西方社会以体质进行区分的种族概念,古代中国以文化进行族群区分更为包容和开放。血缘和外貌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这必然导致在种族融合的过程中存在排他性、对抗性,比如英国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同一国家内相处三百多年后仍相互排斥和撕裂。而文化是可以交往交流交融的,人对于不同的文化都可以后天习得,因此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不同民族的相互转化、融合以及新民族的出现等情况,而任何一个崛起的民族都会以文化进行自我标榜。如党项羌在早期过着游牧生活,没有文字和历法,但建立西夏王朝后,就仿造汉字创造西夏文,仿唐宋建立礼乐制度,并用特殊的髡发区别于当时并存的其他民族政权。这就赋予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文化的柔性和可塑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了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线,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文化上的学习互鉴就成为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抓手。孔子民族观中关于文化的论述既为当下民族工作提供了启发,也应该接受批判性思考。孔子的思想基本上反映出夷狄可以学习华夏文化而华夏不能学习夷狄文化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具有合理性难以推断,但在当今中国显然并不合适。经过长期发展,汉族在事实上已经吸收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化,同时很多少数民族也积淀了大量的优秀文化可供汉族学习,各民族相互学习借鉴的场面在当今中国早已遍地开花。

(三)孔子毕其一生重视文化教育

孔子高度重视礼乐教育,希望人人能成为谦谦

君子,这种思想也贯穿于孔子的民族观,孔子轻视甚至提防夷狄的重要原因是夷狄文化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少数民族尚处于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社会形态,文盲率极高。因此,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中尤其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虽然经过数十年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但还存在着不同民族之间受教育水平差距较大、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依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部分少数民族教育水平偏低等问题。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提高各民族尤其是受教育水平偏低民族的受教育水平是仍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参考文献

- [1] 学习强国. 习近平论文化 (2022 年)【EB/OL】. (2023 -03 -27) [2024 -03 -15].https://www.xuexi.cn/lgpape/detail/index.html?id=2885701381117087568&item_id=288570138111708756
- [2] 张践. 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8.
- [3] 王柯. 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J】. 原道, 2013(1): 89-113.
- [4] 杨翰卿. 先秦儒学“华夷之辩”再思考【Z】.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华夏文明探源”国际论坛, 2018(10).
- [5] 岳焕宽. 浅谈孔子的民族观【J】. 黑龙江史志, 2010(23): 229-230.
- [6] 欧阳辉纯. 论孔子民族观的历史地位【J】. 求知导刊, 2016(2): 159-160.
- [7] 陈慧萍, 何波. 论孔子的夷狄教化观【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7, 9(3): 32-35.
- [8] 董强. 孔子民族观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J】. 满族研究, 2011(1): 110-116.
- [9] 陈玉屏. 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和历代王朝民族政策遵循的基本原则【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6): 27-34.
- [10] 朱圣明. 现实与思想: 再论春秋“华夷之辨”【J】. 学术月刊, 2015(5): 159-167.

责任编辑: 闫丽红

安宁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经验

王雄刚

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团结、凝心聚力的强大纽带。近年来,安宁区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充分汲取域内优良文化素养,着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不断推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实现路径。实践当中,融入了诸多本土元素,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值得当下总结推广。

一、谋划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示范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十二个必须”,“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其中重要一维。近年来,安宁区立足高校、科研机构富集的“文化区”独特优势,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开展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多次获得省市相关部门的嘉勉。今年年初,安宁区立足地方实际,谋划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示范区,旨在探索地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现路径。为了廓清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四梁八柱”,使示范区建设落地生根,积极与省社会主义学院合作,委托专家深入开展“兰州市安宁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践路径研究”,具体从教育宣传、文化建设、社会服务、经济发展、政策支持、交流合作六个大的维度展开,探索地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合理路径。

二、健全教育宣传体系,营造共有精神家园良好氛围

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纳入各级各类教育培训体系,切实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通用教材的推广工作。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学习教育,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通过“校地联盟”“地企融合”等形式协同推进,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夯实交往交流交融基础。近期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契机,着力于“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体实践中,结合地方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主题宣传教育。优化宣传内容,发挥讲师团、专家学者等的作用,加大宣讲力度。通过媒体舆论引导和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声入人心”,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融入实物、实景、实事,潜移默化嵌入心中、注入灵魂,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

三、以文化浸润提升行动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持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在各类学校积极开展中华经典诵

基金项目:中共安宁区委统战部委托课题“兰州市安宁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践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王雄刚,男,法学博士,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读、中华文明礼仪、中华传统技艺等文化浸润提升行动。大力弘扬各民族共享共有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挖掘展示德永象化石、仰韶文化彩陶、古钱币和天斧沙宫等文物古迹,保护展示明长城(边墙)、沙井堡、安宁堡、刘家堡、保安堡、大岔口哨马营堡等城堡遗址,加强传播推广,使之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推动各民族文化互鉴交融,打造了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素养、融合现代文明的著述、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以此为依托,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实践,通过民族文化展示、民族歌舞表演、民族团结亲子活动等形式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具体到学校教育,切实慰问少数民族经济困难学生,开展结对帮扶;构建“大统战”育人格局,在全区26家中小学配备专兼职思政课教师42人,借助“大统战工作格局”打造融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为一体的传播体系,切实提升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际成效。

四、着眼“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共有精神家园走深走实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度融入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一廊一区一带”行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以有形之举、有感之策、有效之方奋力谱写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安宁篇章”。具体实践中,深入推进“平安安宁”建设,提高民族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建立健全由统战部门牵头,驻区高校、公安、教育、网信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处置民族领域风险隐患工作机制。配备民族工作联络员54名,持续做好普法工作,依法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持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着力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扎实开展“结对子”“手拉手”等形式多样的联谊交流、互帮互助活动,积极构建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培育以刘家堡太和社区、沙井驿景宜家园社区为代表的社区示范点20个,组织域内学生赴外地开展交流及非遗体验活动,促进民族团结情谊生根发芽。

紧紧围绕强省会行动,动员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在招商引资、乡村振兴、壮大民营经济等方面建

言献策,大力实施校地党外人才“双百工程”,建立“安宁区统一战线专家智库”,与域外多家工商联签订《互招互引协议》。近期,牵线对接10亿元以上项目2个,培育壮大5家民族食品加工企业,2家民族餐饮企业被命名为“民族团结示范企业”。

五、以校地联盟建设为契机,夯实共有精神家园新格局

发挥域内高校科研机构聚集、文化氛围浓厚、统战人才荟萃的优势,深入推进校地联盟建设。统筹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依托校地统战联盟平台,整合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甘肃农业大学认知馆、兰州交通大学染缬艺术研究所、兰州职业技术学院非遗学院等资源,打造安宁区侨胞之家及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基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推进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推动高校与地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展共谋,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转化科研成果,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搭建平台,借助平台建设不断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上新台阶。定期召开校地统战联盟联席会议,围绕联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开展交流研讨,共商联盟未来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邀请驻区企业加入联盟,开展“校地企”统战联盟试点工作。

六、务实开展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作

围绕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建强用好民主党派“社情民意联系点”、镇街“统战之家”、社区“民族团结之家”,拓展“一线两街三园四馆”宣传阵地,大力实施“桃花源·石榴红”“十个一”品牌塑造工程,推出“兰沟赏杏花”“崖川话发展”等“文旅+农业”项目,以丰富的宣介内容、多样的传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打开新模式。

立足实际、发挥优势、深化创建,突出有形有感有效,丰富形式、创新方法,做深做细做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不断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政治引领,明确细化创建目标及责任单位,建立健全督查考核机制。广泛开展多元民族团结进步活动,组建民族宗教工作专家智库,邀请智库专家为相关人士做专题辅导。依托高校建立“红

石榴”志愿服务队和“红石榴”文化艺术队等,以理论研讨宣讲、文艺创作展示等为载体,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个多宗教的国家,目前主要有五大宗教,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现实中,民族领域的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基于此,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推动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是地方统战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当前安宁区域内群众的信教状况主要涉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实际当中,伊斯兰教领域的“三化两热”“达洼宣教”非法活动、佛教领域的“商业化倾向”等问题依然零星存在。近些年,在党和政府“从严治教”“依法治教”的深入推进中,相关整治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域内民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显著增强。以此为契机,今年上半年,结合宗教工作督查“回头看”,组织宗教政策法规培训两期。为使得宗教中国化工作走实走深,近期,开展高校抵御境外渗透专项整治5次、非法宗教活动专项排查整治8次,尤其是在扎实推进新型宗教活动场所建设中,报恩寺被评为2023年全省宗教界先进集体。

八、以“楼宇统战”推进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

为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近年来,安宁区将统战工作纳入试点楼宇党建工作体系,组建楼宇“新联会”工作站,广泛吸纳楼宇企业、物业、产权方、运营方等各方共同参与的“集团党委+楼宇支部”工作框架,选拔建强“站长-秘书长-骨干”三级骨干力量,建立党建引

领、联盟共治、群团共建等多样化楼宇统战工作坐标,实现党建和统战双覆盖、双加强,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以“新联安宁潮动金城”新阶层活动为契机,搭建教育引导、企业服务、联谊交友、建言献策等平台,夯实党外代表人士人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骨干、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等队伍建设。在试点楼宇设立“一站式”行政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企业推介会”“校企对接会”“营商环境优化法律论坛”等个性化商圈活动,积极助力项目招引,通过牵线敲门招商等形式,打造新时代楼宇统战工作创新标杆。

九、赋能民族特色经济,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尽管安宁区的发展迈上了新台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对突出,既面临补短板、追赶现代化步伐的“双重压力”,又面临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鉴于此,赋能民族特色经济,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今年年初以来,为进一步把推动创业、解决就业作为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不断提升域内民族特色企业营销的核心竞争力,安宁区依据省市“三抓三促”重点工作任务的安排部署,结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工作及当前消费转型需要,开展“直播+短视频”赋能民族经济发展系列培训,旨在不断提升地方民族特色产业领域小微企业、合作社、个体户及自由职业人员经营理念和产品线上售卖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创业致富的能力,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增收。活动成效显著,切实提高了民族特色产业领域人员对“直播+短视频”的认知和实操能力,促进了民族特色产品的推广和销售,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责任编辑:常海哲

爱国主义精神视域下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及时代价值

刘传雷 初金哲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大师。他当时所处的中国可谓水深火热、内忧外患。为了改变落后中国的命运,梁启超提出了新民思想。新民思想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了我国国民素质的新水准,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当前,我国小康社会已全面建成,中国式现代化、“两个一百年”民族复兴梦、国家富强梦的实现,对国民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精神魄,激励着华夏儿女为祖国富强努力奋斗。本文结合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对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予以深度剖析,寻求其新民思想与当代价值观念的契合点,为新时代中国培养合格青年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五四精神 梁启超 新民思想 爱国主义

最近几年,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但对于《新民说》这样一部内容充盈、体系完整、蕴含丰富思想的著作,还有待更深入、更系统全面的研究。并且在《新民说》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众多爱国学生、工人相继罢课、罢工,发起了五四爱国运动。100多年后,历史转了一圈,“启蒙与开启民智”再次成为学界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五四运动是“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1]。本文力求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历史背景分析论述梁启超新民思想的产生条件,解释梁启超新民思想的丰富内涵,结合百年五四精神,以及中共中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通知》精神,联系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阐述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近代中国社会现状与新民思想产生条件

(一)近代中国社会现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中国水深火热、内忧外患,面对国家的生存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率先掀起的是以洋务派为首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面临的问题是解决当时落后的中国缺乏先进武器装备的问题。空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却没有一批懂得时务的人才,武器装备也只不过是形同虚设。正因如此,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军才会全军覆没,同时,这也标志着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仅把学习重点视为武器装备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要独立强大,真正要学习的应是西方先进的政治

基金项目:2024年教育部思政专项“《爱国主义教育基本法》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实践路径研究”(24JDSZK032)。

作者简介:刘传雷,男,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台州学院副研究员。

初金哲,男,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制度。梁启超追随其老师康有为,成为当时近代中国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的伟大领袖,宣扬改革思想。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诏书——“明定国是”,自此正式开始了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因变法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利益,几个月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阻挠了变法运动的开展,时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人大肆破坏变法,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梁启超无奈去往日本等海外国家。

(二)梁启超新民思想产生的条件

梁启超离开大陆后,先在日本接受了许多先进思想。他在《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写道:“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2]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此呼吁国人放弃向遥远的欧洲、美洲国家学习,应该转而向日本学习。

之后,梁启超又去西方国家考察,此时,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刻。在离开澳洲前,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积弱溯源论》,阐明了中国之所以长期积弱的根本原因:“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3]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这份报纸不仅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也可以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梁启超认识到要想真正的变革成功,就必须培养通达时务的人才,即提升国民素质,也可叫做“国民性”。要提升国民素质,就必须造就“新民”。梁启超论述新民的重要性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4]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和道德思想,最终著成《新民说》。

二、梁启超新民思想内涵丰富

(一)何为“新民”

“新民”一词,直接取自于儒家经典著作《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办报宗旨中说:“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5]所谓“新民”,在《新民说》一书中表示,应该是有社会公德、爱国思

想、独立人格、尚武思想的新国民。并且,“新民”中的“新”有两个意义,一是打磨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有的文化造就新民,二是兼采弥补我们中华民族没有的文化造就新民。二者若缺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造就新民,这说明培养新民的关键是兼采中西方文化精髓、博取众家之长。梁启超对“新民”的解释既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同时也强调了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

(二)“新民”新在何处

第一,新民应该是具有公德的人。道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德,一种是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6],二者相得益彰。没有私德,一个人不能很好的在社会上立身,而没有公德,一个民族则没有凝聚力、战斗力。梁启超在《论公德》指出,对于两种道德种类,我国国民最缺为社会公德。所以,所培养的新民应该具有社会公德。面对国家的生存危机,只有每个国民都具有社会公德,才能真正使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第二,新民应该是有国家思想的人。梁启超在《论国家思想》中提到,人群的初级状态是有部民而无国民。我们从部民发展演变为国民,部民和国民是有区别的,部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群体中,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具有民族精神和政治觉悟的人是国民。封建时期是君主专制,民众不理解什么是国民,只把自己当做被压制的臣民。他们只把国家看作是君主的私产,而不是国民的共有财产。所以,当外国侵略者入侵我们国家的时候,多的只是看热闹的人,很少有人站出来捍卫自己国家利益、民族主权,这也是我们国民缺乏国家思想的原因。国家要想真正强大起来,必须转变民众的思想,将被奴役的旧臣民培养成为有国家思想的新国民。

第三,新民应该是有权利和义务思想的人。公民具备权利和义务思想是公民具有国家思想的关键。“义务与权利对待者也,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7]梁启超认为,在中国,国民缺乏义务思想。他这样评论道:欧洲民族对国家的义务,是不担心且不畏惧其有多重的,并且必要时还会索要一定的权利作为弥补。中国人民对国家的权利总是担心自己拥有的太少,并且总是想着逃离应尽的义务以寻求自我潇洒。对比欧

洲人和中国人之间对权利与义务观念的不同,进而导致国家实力水平的差异。因此,梁启超主张新民应该有权利和义务思想,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第四,新民应该是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品质。独立、自由、平等这些品质在我国古代基本是不存在的。在古代,受君权天授思想和君主专制统治的影响,民众长期被奴役,久而久之也就把自己看作是“低等”的人。因此,梁启超认为,只有向民众灌输人人皆平等,人人皆自由的精神,才能推动民众去追求自由、平等,加速专制王朝的灭亡。同样,要想培养独立、自由、平等的新民,就必须彻底推翻长期存在于中国几千年的王权专制制度。

第五,新民应该是有进取精神的人。梁启超在《论进取冒险》中指出,欧洲国家比中国强大的主要原因是其具有进取、挑战、冒险精神。同时,梁启超还以麦哲伦、哥伦布、马丁·路德等人做论证。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崇尚天赋神权思想,认为自己能力的获得是一种天意,当国家发生灾难也是一种天意,他们遇事占卜,希望得到上天的垂怜,不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国人缺少一些进取冒险精神,面对这种情形,梁启超才提出要培养具有进取冒险精神的新国民。

第六,新民是应该有尚武精神的人。在近代,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究其原因,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爱战斗的民族。中国提倡“仁爱”思想,我们爱好和平,懂得礼让。当发生冲突时,一般会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古代,和亲可以称得上典型的例子。国家统治者也多是尚文轻武,利用仁、义、礼、智、信等三纲五常思想教化民众,进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再者,“由于中西方饮食的差别,以及近代中国人吸食鸦片的结果,进而造成了中国人的“体弱”现象。这样看来,面对西方侵略者的入侵,中国最终战败投降也就不足为奇了。梁启超在逃亡日本之后,接触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8],一种为了自己荣誉去战斗,哪怕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牺牲生命的精神。所以,梁启超提出,中国要想变得强大,最重要的是国民要有这种尚武精神。

(三)培养新民的具体做法

第一,国民自身应该主动吸收“新民”思想。“打

铁还需自身硬”,要培养新民,首先要从每个民众自身入手,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国家的生存危机和自己思想的愚昧,民众才会积极主动地吸收“新民”思想,进行自我教育,促进自我提高。只有自己思想的进步才会慢慢带动整个社会、国家的进步。梁启超的文章《少年中国说》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少年强,则国强”就体现了这个道理。

第二,通过教育手段加强对国民“新民”观念的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一个国家要想走向富强,就应先从教育入手。在我国古代,历代皇帝都善于利用学校来宣传自己的政治意图,进而控制民众的思想,达到稳定社会的作用。梁启超同样将教育视为培养新民的重要途径,通过学校教育宣传自己的新民思想,逐步达到他的“使民新”的政治目标。

第三,利用大众传媒营造“新民”的舆论环境。在梁启超的一生中,创办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报刊。其新民思想就是通过连载的形式刊登在《新民丛报》上,之后整理成为《新民说》一书。梁启超通过报刊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民众,呼吁民众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高国民的政治觉悟,从而推动国家改革,提升综合国力。

三、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时代价值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不仅对当时落后的中国走向独立富强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过程中,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提升国民的素质,推动青年成长成才,构建社会公德和强化爱国主义情感依然有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寻求其新民思想与时代价值观念的契合点,为新时代中国培养合格公民、青年才俊提供新的启示和价值。

(一)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

在国民素质方面,我们应着重培养当前国民的权利和义务观念、进取冒险精神以及尚武精神等整体素质。

第一,应重视培养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观念。梁启超虽然很早就倡导权利和义务观念,但权利和义务观念在当今依然没有很好地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中。民众不能很好的区别“我可以做什么”和“我应该做什么”。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对等的。一名政府官员不

能只享受高官厚禄,却不履行解决民众生计、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一名教师不能只享受职业荣誉,却不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一名医护人员不能只享受“白衣天使”的称号,却不履行救死扶伤的责任。权利、义务思想很重要,它能警醒我们享有权利的同时做到履行义务,警醒我们要有规则意识,真正做到在其位,谋其职,尽其责。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新征程中,我们应该着重培养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思想,灌输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依法办事,依规处事,打破过去靠关系办事的旧俗,建设良好的干事做事创业新环境。

第二,应重视培养公民、青年的进取冒险精神。进取冒险精神就是要尝试他人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在新时代,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创新创业精神。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共64次提到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9]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和重要指向。目前的社会存在更多的简单模仿现象,缺少探索创新。就娱乐性节目而言,有些媒体向我们传达的只是简单的娱乐性、低俗性的节目,节目背后并没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教育意义。而且,大多数娱乐节目也并非是本国原创,更多的是模仿国外的娱乐节目形式。

所以,当前我们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重视创新。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一个民族向上发展的力量源泉。青年作为祖国的栋梁,国家建设发展的中坚力量,更应着重培养其重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造品格。无论是从文化、娱乐、教育、科技等方面都要有我们自己的发展思路,开拓创新、奋勇拼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第三,应重视培养公民的尚武精神,培育青年的健康体魄。在当代,提倡国民应具有尚武精神,我们应该着重培养国民的体力、耐力。在国家应试教育的倡导下,从幼儿园到高中,所有的学校和家长特别重视孩子的知识教育,却忽略了孩子的身体健康。体育课被语文、数学等科目的老师时常剥夺,课后的玩耍锻炼时间更是被各种补习班所占用。孩子的身体在

过度消耗,学习成绩也很难取得更好的效果。相比西方,我们国民的体力还是比较弱。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种不良现象,早在2010年,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家明确把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定为素质教育。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的主题依然没有变。当前的高考改革,减轻了学生一考定终身的压力,有利于学生保持良好心态,更好促进学生心理与身体的全面发展。这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有利于扭转人们重知识轻体力的错误观念。这说明我们国家已经从单纯注重知识教育向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特别重视人才素质的综合提高和军队、国防建设。对于人才,身体是革命的基础,一个人首先要有好的身体,才能实现其他方面的价值。一个青年只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的提高自身综合能力。对于军队,只有注重军人的身体素质,才能整体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才能提高练兵备战的质量和水平,最终实现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二)提升公民及青年的道德修养

第一,加强国民、青年的社会公德建设。遵守社会公德是对一个合格公民的最起码要求。目前,我国公民的社会公德意识有些欠缺,例如之前发生的长春药厂制售假药事件、高铁霸座事件和升旗仪式后的满地狼藉等等事例。面对社会公德的缺失,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一方面,公民要提升自己的公德意识,争做新时代的“文明人”。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利用学校教育向民众、青年灌输公德意识,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约束,提升公民、青年的精神境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加强国民、青年的个人私德构建。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都在倡导和谐社会建设。而一个好的、有秩序的良性社会,培养公民的私德是关键。我国古代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先注重民众的私德培养。我们不缺私德,古代社会一直是王权专制统治,除了法家思想提倡的依法治国,还有儒家思想提倡的“仁”和“礼”。“仁”是最高的道德标准,“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统治者往往利用它们来维护宗法制度和王朝伦理道德,巩固其统

治。而“仁”和“礼”的思想经过几千年的继承和发扬,直到今日,也一直影响着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

要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应培养公民孝敬父母的思想意识。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个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意识。但我们所谓的“孝敬父母”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父母所需要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国家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便利的交通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便捷的通讯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但现在,国家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远游的可能,恐怕我们却已经忘记了“父母在”了。电视广告时常播放着回家看看、陪陪父母、“电话、视频不如一家人在一起吃一顿饭”等公益广告,目的是提醒远方的游子要常回家看看。父母真正需要的是我们对他们的陪伴,不是我们为他们买的各种礼物。“空巢老人”社会现象越来越普遍,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反思。我们有责任关心照顾好我们的父母,当我们真正有了孝敬父母的责任意识,我们的社会就会形成敬老、爱老的良好风气。

其次,我们应该做到诚实守信。“民无信不立”,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失信现象常见于报端媒体,一些青年大学生中出现了考试作弊、替考、替课等不诚信行为。因此,要积极营造良好社会风气,惩恶扬善、弘扬主旋律。国家要加强诚信道德体系构建,并有机融入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约束失信行为,为建设诚信社会提供法律保障。新时代新作为新形象,我们还要继续推进个人道德建设,着力提升青年的道德素养,使中国礼仪之邦、文明之邦伫立于世界。

(三)加强国民尤其是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始终。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于中华儿女的血脉当中,它在不同时期,会表现出不同的内涵。民国初年,爱国主义是让中国摆脱军阀混战的局面。抗战时期,爱国主义表现为击败日本法西斯,寻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在新时代,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乐于奉献、爱

岗敬业、投身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把国家统一、民族富强作为至高目标和无限荣誉。

爱国主义的本质是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岗和爱家的高度融合统一。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一个国家具有的伟大民族精神,是衡量其综合实力的价值尺度。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人不行,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民族更不行。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走向国家独立、富强。回首近现代史,我们能打败西方列强,能骄傲地挺起脊梁,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主要是因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坚强的后盾。

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是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要通过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激起国民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爱,增进公民的民族意识、国家情愫,提升民族归属感、自豪感,推动全体人民努力奋斗,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毋庸置疑,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广大青少年。要把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夯实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的一个重要工程,从娃娃抓起,让青少年从小受爱国主义教育熏陶影响,在内心深处产生爱国情怀。当他们进入社会以后,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才能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四)加强青年的奋斗观、斗争观教育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我们党和人民,以及广大青年在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引导青年继承发扬永久奋斗的光荣传统,勇于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增强斗争本领,担当起家庭、单位、社会、国家的责任、重担,成长锤炼自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好传统一点都不能丢”。^[9]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深情寄语青年,指出青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脊梁,需引导青年继承发扬永久奋斗的光荣传统。五四运动已过去一百多年了,由爱国学生和工人发起的五四运动的伟大光荣传统永续光芒。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沦为一个受欺压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自此欺压与反抗并行,改良派、革命派、实业救国派、保皇派等等,各个阶级都实践了自己的方案: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但都没有成功地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践是真理的来源,先进的革命党人从无数次的失败之中汲取教训,并不断地完善、革新思想,直到与红色的十月革命不期而遇,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五四运动恰逢而生,标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处在黑暗与迷茫之中的中国亮起了明灯,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无数青年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忘我奋斗,勇挑重担,把自己的青春奉献于国家的建设发展中。在改革开放时期,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实践,锐意进取,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到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继承发扬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当代青年要立鸿鹄志、做坚定者。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把个人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勇挑重担、勇克难关、勇斗风险,挺立时代潮头,勇做时代先锋。要练真本领,做实干家。”^[10]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当代青年要继续磨砺英勇奋斗的意志,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凝聚团结奋斗的力量,培育持续奋斗的情怀。脚踏实地,不做没有实绩的“口号者”,而是做兢兢业业的“实干家”。才能成为加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最终我们才能骄傲的喊出:“青春万岁,强国有我!”

四、结语

翻看梁启超的《新民说》,其重在阐述国民的新标准,强调思想的教化,却没有具体提及实用的改造方法。梁启超认为国家的落后是因国民的劣根性。单纯的更新民众思想,只讲出民众要有权利义务思想,

要有公德等等,而没有根据具体的标准提出可操作性的改造方法。梁启超过分夸大了思想教化的作用,是达不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的。另一方面,梁启超的思想也呈现出多变的特点,每一次当他的经历发生重大转折时,其思想就会发生变化。他的思想从温和改良走向了激进革命。正是因其思想的多变性,也造成了“新民”的变化。

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对于我们最大的好处是汲取个人或者事件所蕴含的道理,不至于重蹈前人覆辙。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在借鉴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同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还要根据国家的发展要求、当今社会的现状,以及国民素质的发展水平,因时因地制宜,向民众提出适合他们自身,以及适合国家发展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梁启超.饮冰室主人自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61.
- [3]梁启超.陈书良.梁启超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 [4]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48.
- [5]梁启超.本告白【N】.新民丛报:第1号,1902.
- [6]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62.
- [7]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77.
- [8]王泽平.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及其现代教育价值【D】.山东师范大学,2018:25-30.
- [9]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N】.人民日报,2017-10-25.
- [10]继承发扬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N/OL】.经济日报,2019-05-04.

责任编辑:闫丽红

集体记忆转化为社会记忆的凝聚力

——以哈布瓦赫理论分析纪录片《决战兰州》

王润博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在过去的岁月,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和伟大的改革开放,发展成为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飞速提升的现代化大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在全球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形势下,中国需要更加坚定地秉持自主创新、开放合作、深化改革,去推动中国故事不断谱写新篇章。纪录片《决战兰州》即是一个谱写中国故事的新篇章。

一、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启示:社会需要记忆

“过去不会像在睡梦里那样重现……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曾在他的书中这样记载,他认为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群体或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

“集体记忆”的概念被提出已近百年,社会各界与学术界都非常重视,有关集体记忆的相关成果已经为人类各群体历史文化的形成、演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但目前对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还未形成体系,有待深入。

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作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一开始就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社会为何需要记忆?因为,社会总是让人觉得似乎今天的世界与过去的世界相比,总有些莫名的不完美。许多普通人也认为,和自己的童年与青年时代相比,现今的生活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缺失感和沉重的压抑感。因此,社会之所以需要记忆,因为记忆赋予社会的“过去”——历史的魅力,把最珍贵、神圣的事物贮存在与现今相对的另一个维度里。

那么,社会又是出于何因赋予“过去”一种珍贵与超脱之感?在社会中生存的个人,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自身处在种种无孔不入的约束之中,比如信息茧房、行业壁垒、专业生态危机等等。我却想起哈布瓦赫曾在书中提到,希腊的哲学家们并不是把世界的末日看作黄金时代,相反,他们认为世界的开始才是最美好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奋斗经历中,我们从虚弱贫穷到强大富裕,从封闭落后到进取开放,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曾经历过轮番挑战,但一直在不断地努力和奋斗。在新时代飞速发展之际,我们也许更应该回顾总结历史,更好地应对未来的路。新中国正是因为有了那些曾经参与过战争的老兵的记忆,而让当代青年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时间如白驹过隙,曾经参战的老兵们亦垂垂老矣,留下来的战争亲历者越来越少,他们对历史的回忆是我们当代青年最为宝贵的非物质精神遗产。

二、纪录片《决战兰州》呈现集体记忆在建构历史和传承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集体记忆的素材库目前随着新媒体时代发展越来越丰富、详实,各类题材的口述史纪录片也层出不穷,但关于兰州战役的丰碑式纪录片仅有一部,即由兰州市委宣传部出品的《决战兰州》,它为兰州战役的集体记忆素材库充实了内容,也为新一代年轻人们对于构建兰州历史的集体记忆做了贡献。《决战兰州》是由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兰州广播电视台、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委宣传部、中共兰州市七里河区委宣传部、兰州广播电视传

作者简介:王润博,女,兰州文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播中心联合制作出品的3集历史文献纪录片。该片以呈现中国光辉革命历史的瑰丽多姿和探寻中国军人的精神底色为主线,首次从多维视角客观解读了兰州战役的历史过程。片子以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的胜利历程。该片不仅是一部军事题材的作品,更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和人民军队成长历程的优秀作品。在该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英勇奋斗和坚定信仰,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作用,展现了红色文化中的集体记忆,凸显了中华民族在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中,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

纪录片聚焦于历史长河中的典型事例、典型人物、典型故事,以“呈现中国光辉革命历史的瑰丽多姿和探寻中国军人的精神底色为主线,力求将气势恢宏的实时性格局与饱含血肉真情的细节和故事浑然一体,铺陈为一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实时性视觉画卷和文献资料。影片共三集,通过影像记录和口述历史等方式,再现战争场景和人物,呈现了集体记忆在建构历史和传承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1949年8月,解放战争中西北地区的最后一场关键决战,在金城兰州打响,人民解放军经过艰难试攻和三天精心战斗准备,迎来最终的决战时刻。当年九死一生的战士们通过口述史纪录片表达记忆,力求凸显这场恶战的历史原貌,这是该访记录片的一项重要任务。

《决战兰州》作为国内首部记录兰州战役的纪录片,凭借精良的制作与客观公正的视角讲述发生在兰州的战役,也被称为是兰州文献资料影片当中的一座丰碑。多名进入耄耋的老兵在该记录片中追忆当年兰州战役的苦难与勇气,以精彩的视觉和故事化的口述呈现了当年鲜活的历史原貌,让集体记忆转化为社会记忆的理论意义再一次被认识和重视。

从广义来看,纪录片中只要涉及有口述历史的部分就可以称之为“口述历史纪录片”。但在狭义来说,口述历史的纪录片必须以事件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做口述,并把口述内容当作纪录片的主题内容,解说词与其他视觉和音频手段仅为服务这一主体而存在。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纪录片透过镜头记录发生过的事件,口述历史也是由亲历者讲述,挖掘真实的历史,二者在纪录片真实的原则上有着共性。纪录片《决战兰州》首先对历史事件的场景还原下了很大功夫,通过大量的历史影像资料和战场遗迹等方式,再现了当年兰州战役的历史场景,使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当时的战争氛围和历史事件。这种历史事件的呈现方式,不仅让观众了解到战争的残酷和壮烈,更让人们体会到历史的厚重感和集体的记忆。再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细致,纪录片通过对参加过兰州战役的老战士、民兵等人物的拍摄采访和个人口述历史等方式,塑造出一批鲜活的战士形象。这些老兵的故事与经历,不仅让观众了解到战争中个体的命运和时代的联系如此紧密,更让人们感受到集体记忆中蕴涵的力量和战争年代中的坚定信仰。最后是集体记忆的传承,纪录片通过故事化的人物口述还原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重新唤起国人对民族历史的记忆,并以影像化的历史呈现将兰州战役的时代记忆传承下去。

其次,在纪录片《决战兰州》中,集体记忆的建构理论及其意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再现历史场景、塑造人物形象和传承集体记忆等方式,这部纪录片不只是让观众了解到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更为重要的是,以集体记忆的方式传承过去鲜活的历史,不仅对于了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和精神塑造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口述历史的纪录片之所以受到历史学家和纪录片界的追捧,很大原因是它能快速的抢救史料。通过影像记录,为史学家提供了更全面和多元化的观察视角。口述纪录片在拯救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历史,强化了文化遗产这项功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通过这部纪录片,观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红色文化的力量,从而增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决战兰州》中老兵何志瑛依然记得十分清楚,对于当年在兰州的战役中,身边团、营、连长的名字,老人张口就来。

回首往事,时光如梭。笔者的爷爷也是参加了兰州战役的老战士,他于194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抗日武装斗争,在土地改革减租反霸运动中做出积极贡献,先后在西北野战军内任职,参加解放陕西富平战役、平凉战役、解放兰州战役、河西剿匪等多次战役,多次立功受嘉奖。他曾时不时地回忆起自己的军旅生涯,对于当年他亲历过的兰州战役,每当他想起就会陷入沉思……让我动容的是,在他患阿尔兹海默症之后,碎片化的记忆却总也磨不碎对于自己战友的记忆,他一个人在记不得自己家的住址的情况下,却能打车直奔外地去找寻自己的老战友,几个老战友接待他,在一起把酒言欢,只有那时的他不像是一个患病的耄耋老人,我仿佛看到他为解放兰州而战的画面、看到他风华正茂的军旅时光……我想,关于他人生中的经典故事,可以从西北野战军的多战战役故事里去寻找,那里,也许有他的一息灵魂尚在,那是中华儿女为国为家永无止息、一心奉献的坚定信念。



兰州战役——解放军占领兰州中山桥史料图片

纪录片《决战兰州》自播出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历史视角和生动的叙事手法,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这部作品更深入地挖掘和传承了红色文化,为当今社会带来了深远的正面宣传和社会影响。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也为社会注入了正能量。在当今社会,一些人对于历史的认识和对于红色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和淡漠。而这部纪录片通过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影像,让观众重新认识到红色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它让人们明白,红色文化不仅是历史的记

忆,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和精神支柱。这种正能量的传播,对于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决战兰州》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部纪录片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和讨论,更引发了一系列相关活动和研究的热潮。例如,一些学校和组织纷纷组织观看这部纪录片,将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教材。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也对这部纪录片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从多个角度挖掘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这种广泛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推动了红色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理解和探索红色文化。而纪录片《决战兰州》则以其生动的影像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展现了红色文化中集体记忆的凝聚力和传承力。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铭记历史、传承文化、凝聚力量,我们才能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不断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三、将集体记忆转向社会记忆:深化文化自信增强国家凝聚力

集体记忆,作为历史与文化交织的纽带,承载着民族的情感与认同。然而,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何使这种局限于特定群体的记忆转化为全社会共享的社会记忆,成为提升文化自信、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关键。这一转化不仅涉及文化层面的深入探索,更触及到民族心理和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这种记忆具有鲜明的群体性和地域性,是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迁,这种记忆也面临着被边缘化、淡化甚至遗忘的风险。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深刻认同和自豪。它源于对文化价值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体现在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自觉与自信。同时,集体记忆向社会记忆的转化也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深层次要求。国家凝聚力是一个国家内部各族群、各阶层之间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对共同历史和文化的认同与尊重。通过广泛传播和普及集体记忆中的优秀文化元素,我们能够打破地域和群体的界限,让更多人共享和认同这些文化记忆,从而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然而,要实现集体记忆向社会记忆的转化,并非易事。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实践。首先,加强对集体记忆的研究与挖掘工作至关重要。这需要我们深入挖掘集体记忆背后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提炼出其中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内涵。同时,还需要对集体记忆进行科学的分类和整理,以便更好地进行传播和推广。其次,创新传播手段与方式也是关键所在。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多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将集体记忆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例如,通过制作纪录片、开发文化APP等方式,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了解和接触到这些文化记忆。当然,我们还应意识到这一转化过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政府、媒体、教育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长期投入。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将集体记忆真正转化为社会记忆,为提升民众文化自信和国家凝聚力作出积极贡献。

结合纪录片《决战兰州》来探讨集体记忆如何转向社会记忆,片中展现的不仅仅是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壮举,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底蕴。这种记忆的转化,使得兰州战役不再只是老兵口中的回忆,而是成为了全社会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它通过影像的直观性和叙事的感染力,让更多的人形成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记忆。这种记忆的广泛性,不仅体现在地域和人群的覆盖上,更体现在对历史事件和文化价值的深度认同上。

当集体记忆转化为社会记忆后,民众的文化自信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也成为了激发民众自豪感

和归属感的重要源泉。人们通过观看纪录片,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进而更加自信地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挑战。通过共同回忆和分享这些记忆,人们能够形成更为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和国家意识,从而更加团结一心、共同奋斗。

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人们面对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件或者自身脱离原有社会环境时,需要借助他物来重建或者唤醒记忆。近年来随着短视频行业进入红海状态,关注文字资料的人越来越少,社会大众逐渐被多元碎片化信息或短视频包围着。当代青年群体对于历史大多是从影视中获取,相比枯燥单一的文字研究,纪录片的传播能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不仅可以把史料里晦涩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影像,又能在温情的视角下帮助观众建立更全面的历史观,极具教育意义,更有利于提升民众的文化自信和对国家的凝聚力。

此外,我们还需要在记忆的转化过程中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激发真正的文化自信和国家凝聚力。因此,我们在制作和推广纪录片等文化产品时,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避免对历史进行歪曲或篡改。

综上所述,将集体记忆转向社会记忆是一个涉及文化、心理和社会结构多个层面的复杂过程。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索这一转化过程,我们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和国家凝聚力,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繁荣的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闫丽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指引研究

王 涛 肖安俊

【摘 要】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相融合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议题。本文在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中国民主理念契合性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中国民主政治中的历史贡献及其对民主理念的影响,进一步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并提出了具体的路径指引,旨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丰富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 路径指引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正日益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和生命力。“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1]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价值,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路径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主思想、治理智慧和道德准则,这些深厚的文化元素不仅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核心价值上高度契合,更在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通过深入挖掘和应用这些文化元素,不仅能够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体系,还能在实践中推动民主政治的本土化创新,从而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耦合性分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耦合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价值理念的契合上,更在于实践层面的相互促进。具体来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深深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和实践之中,为其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强大的精神支撑。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繁荣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中国民主理念的契合阐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积淀的精髓,它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规范、治国理念等深厚文化元素。这些元素与新中国民主理念之间存在着深度契合,这种契合不仅体现在价值观念的相通性上,更表现在制度实践和创新发展的互补性中。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新中国民主理念的核心价值不谋而合。自古以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就深入人心,“民本”思想强调君主应以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与现代民主理念中强调的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作者简介:王 涛,男,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研修培训中心(西北师范大学)研究员,博士在读。

肖安俊,男,临夏现代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法学硕士。

高度契合。新中国民主理念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并将其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践,确保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与新中国民主理念的协商共治相印证。“‘和合’精神强调和谐、协调,主张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3]这种精神在新中国民主政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就体现了传统“和合”文化与现代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各党派、各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就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实现共同参与国家治理的目标。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与新中国民主理念的法治保障相呼应。传统文化中,“法”的概念源远流长,虽然与现代法治内涵有所不同,但其中蕴含的公平正义、定纷止争的精神是相通的。新中国民主理念在推进法治建设时,不仅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更将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结合,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措施,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这种法治保障确保了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理念的深度融合。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中国民主政治中的历史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对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建构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为新中国民主政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还在实践过程中影响和塑造了民主政治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稳定的价值基础。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仁政”理念,以及“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为新中国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导向。这种导向在随后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贯彻,如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都体现了对民众利益的深切关怀。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观念也为新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供了文化支撑。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大一统”观念不仅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统一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还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协作。这种文化支

撑为新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在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其中蕴含的丰富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为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虽然与现代法治有所不同,但其中蕴含的公正、公平理念,为新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律体系建设中,不少法律原则和精神都受到了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的启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在新中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民主政治不仅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相应的文化土壤。”^[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理念,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等,都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塑造。这些理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不仅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参与意识,也为新中国民主政治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中国人民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它不仅体现在对民主理论的价值塑造上,更彰显在民主实践的方式与特色之中。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新中国人民民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价值基石。自古以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就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这一思想强调国家政治生活应以民众福祉为依归,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必须为民所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民本思想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转化为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民主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新中国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了人民通过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方式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实现了民主权利的真实性与广泛性。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念,对新中国的民主实践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

和睦共处,以及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5]这种和谐观念在新中国民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在协商民主方面,新中国就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通过人民政协这一统一战线渠道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精神,为中国人民民主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传统法治文化中虽然缺乏现代法治的完整体系,但其中蕴含的公正、公平理念以及礼法并重的思想,对新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中国在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强调法律的公正实施与严格监督,从而保障了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促进了民主政治的规范化与制度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积淀,蕴含着深厚的民主理念和治理智慧。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其根基在于人民,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以民为本。因此,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特色,更能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提供文化支撑和操作指南,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

(一)坚持历史性与现代性相统一: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蕴含着世代相传的价值观、道德准则和治国理念。在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时,必须深刻认识到文化的历史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进而推动民主理念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理论支撑。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看,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以及“大同”理念,都与现代民主的核心价值高度契合。这些理念在历史上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构建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新时代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镜鉴。因此,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首先意味着要深入挖掘并继承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理念,将其作为新时代民主建设的文化基因。

然而,传承并不意味着固守成规,而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现代性要求我们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命力。”^[6]不难看出,这种创新与转化的理念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应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理念与现代民主制度巧妙地结合起来,既体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彰显现代民主的原则和精神。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实现形式,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向前发展。

坚持历史性与现代性相统一,还体现在对民主价值的持续追求和实践中。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理念为新时代指明了发展方向,而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则要求我们应该不断创新民主的实现方式。因此,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历史,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又要面向未来,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民主形式。这种统一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是对现代民主价值的坚守和推进。

(二)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以优秀传统文化指导民主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的丰富思想和价值观念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就是以优秀传统文化为理论指导,将其融入民主实践中去,同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些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性体现在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治理理念上。儒家文化强调的“仁爱”“和谐”,道家倡导的“无为而治”“顺应自然”,法家主张的“法治”等思想,都为现代民主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这些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例如,儒家的“仁爱”思想,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注重培养道德情操,以爱心和善意对待他人,努力营造和谐友爱的社会环境,实现人与人

之间的和睦共处;再如,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和“顺应自然”的理念,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应该尊重每个个体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不过度干预,让民主制度自然而然地发挥其作用;而法家的“法治”思想,则强调的是一种规则之治,即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既定的法律规则,让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平等的保护。

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的实践智慧。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应当将这些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政策措施。例如,可以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在民主决策过程中强调共识与协商,促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同时,通过实践不断检验和修正理论,确保民主实践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还体现在对民主价值的持续追求和实现上。“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理念为我们提供了追求民主价值的方向和目标,而实践则是实现这些价值的唯一途径。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推动民主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结合地域文化特点推进民主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需要在具体实践中考虑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确保民主建设既符合一般规律,又能贴近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关键。唯有此,才能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落到实处,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理念、道德规范和治理智慧,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例如,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这种普遍性意味着,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历史如何发展,或者文化背景和国情如何差异,推进民主建设都不能违背这些基本原则。同时,这些普遍原则也为推进民主建设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指导民主建设如何结合地域特点进行民主实践。

然而,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经

济和社会条件差异显著。因此,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地域文化的特殊性。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需要更多地关注公众对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参与度和透明度。这种特殊性的考虑,有助于国家制定出更加符合当地实际的民主建设方案,从而提高民主实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还体现在对民主制度的创新和发展上。一方面,“要坚持民主的基本原则和普遍价值,确保民主制度的公正性和合法性”^[8];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地域文化的特点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对民主制度进行必要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创新和发展既是对普遍性原则的丰富和完善,也是对特殊性需求的回应和满足。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指引

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成为时代的呼声。积极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此提供路径指引,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精髓,旨在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铺就一条更具中国特色、紧密贴回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而在新的历史阶段焕发出独特的民主光彩。

(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发展

首先,汲取智慧的过程需要深入研究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伦理道德和社会治理理念等,都是五千年华夏文明留给世人的宝贵资源。通过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和思想流派,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其精髓和要义,从而为现代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其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转化为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和实践,这并非简单地照搬或模仿,而是需要我们以批判性的思维和创新的精神去深入研究和灵活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确实蕴含着诸多宝贵的理念和做法,然而,这些传统的元素可能并不完全契合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因此,在借鉴和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必须进行细致地

甄别与筛选,保留那些对现代民主政治建设有积极推动作用的部分,同时摒弃或改进那些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元素。更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以创新性的思维对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使其与当代民主政治理念和实践深度融合。

最后,实际应用是检验汲取智慧成效的关键环节。在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过程中,我们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相融合,通过实际应用来不断探索和完善。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通过不断地实践应用,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实际应用价值,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二)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拓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渠道

一是弘扬儒家思想,强化公民责任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这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公民参与精神不谋而合。通过弘扬儒家思想,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自觉和公共意识,进而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来。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开展儒家经典诵读、道德讲堂等活动,引导人们领悟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礼义”等核心价值观,从而提升其社会责任感,促使其更加珍视并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二是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和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诗歌、戏曲、说唱等多种深受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这些形式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9]可以巧妙地将民主理念、参与方式等核心要素融入这些艺术形式之中,通过精心演绎和传播艺术作品,潜移默化地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入了解并积极参与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去。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技术革新,应充分利用好网络平台的力量,诸如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积极传播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主思想。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拓宽民主理念的传播渠道,还能有效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民主进程,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共同推动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三是充分利用传统节日,丰富民主参与的形式。传统节日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在节日期间组织各式各样的民主参与活动,例如座谈会、民意征集等,旨在让广大人民群众在享受节日氛围的同时,也能积极参与到民主决策的过程中。例如,在春节期间,可以组织座谈会,广邀各界代表,共商民主发展大计。通过此举,不仅能为节日增添趣味性,更能有效拓宽民主参与的途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与转化。

(三)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作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面覆盖与深化

一是深入挖掘与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强化民主理念的普及与传播。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民主理念相契合的元素,通过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将这些传统智慧与现代民主理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价值观。同时,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如出版物、影视媒体、网络平台等,广泛宣传这些理念,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知和认同,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是融合传统文化元素,丰富民主实践活动。“在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可以巧妙地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使民主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增强民众的参与感和归属感。”^[10]例如,在社区治理中,可以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和谐共处、团结协作的精神,推动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商,共同解决社区问题。此外,还可以广泛开展具有文化特色的民主实践活动,如“民主议事会”“民主恳谈会”等,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中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开拓和提升民主教育的内容和途径。教育是提升公民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核心途径,应当巧妙地将传统文化与民主教育相融合,通过精心设计的相关课程和文化活动,从小便着力培养学生的民主素养与公民责任感。此外,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资源也不应被忽视,应充分利用这些平台,开展多元且富有吸引力的民主教育活动,以此全面提升全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

(下转第71页)

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

张全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通俗表达,是党的执政生命线——群众路线的生动诠释,道出了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谁就会赢得老百姓的拥护,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执政规律和历史规律。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用鲜明的群众观点和独特的群众工作,创新了这一历史情怀,更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两点一存”历史地位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情系人民:“英雄一世 坎坷一生”

习仲勋同志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洪流中投身革命。在革命处于低潮、个人身陷囹圄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艰难岁月里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甘地区举起工农武装割据的大旗。在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他21岁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32岁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6岁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49岁受到错误处理,65岁复出,67岁回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他传奇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更是坚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群众疾苦,担当和展示了“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的责任与胸襟。

习仲勋同志“英雄一世,坎坷一生”,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始终以“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为己任,密切联系群众,坚定地认为党的利益同人民利益是一致的。始终对党绝对忠诚,以

党和国家大局为重。始终心系群众疾苦,以炽热之心对待人民群众的事情,亲身躬行,一以贯之。始终坚定党性、实事求是。他用伟大的革命精神、勇敢的斗争毅力、宽广的大局胸怀、朴实的为民情怀,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的光辉典范,有力践行了“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情系人民的精神。

来自人民:“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视人民群众如父母,为之奉献出一腔赤子之情,群众也衷心拥戴和关爱这位年轻领导者。

在兵运工作中,习仲勋与士兵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进行革命宣传,启发士兵觉悟,培养兵运骨干。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一村一村搞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提出并实施了土地政策、财政粮食政策、军事政策等“十大政策”,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习仲勋同志和当地群众相处得很和谐,他很随和,很亲切,对同志,对老百姓,从来没有一点儿架子。他和陌生人见面,三两句话就能说得亲热起来。他亲自深入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把一些有觉悟、有胆识、能说会教的女青年培养成为妇女干部;积极发动群众,建立雇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有一次,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路过一个老百姓家,忽然看见习仲勋同志在院子里帮人家推碾子。同桂荣就问他:“你咋干起这活来了?”他正忙着

作者简介:张全钰,男,甘肃南梁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

推碾子,朝同桂荣笑笑,没说话。周围老百姓就说:“习主席说这碾子窍道不好,他给修了一下,现在推起来可轻快了。”他常常教导南梁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一定得要牢记我们的使命,工作中,我们要一切服从党的领导,不拈轻怕重,不躲奸溜滑;生活中,要关心集体、关心他人,联系同志,时刻不忘人民的要求,让根据地人民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并努力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参政权,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使习仲勋同志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使边区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又回应群众需求,及时在南梁设立集市,如荔园堡集市。据曾任陕甘边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回忆:“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同志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1942年秋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对习仲勋与群众的关系,作了精辟而生动的概括,称赞他是“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这份至今保存在习仲勋档案中的组织鉴定生动地反映了他同群众的鱼水深情:“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习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农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睡一会儿。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1945年10月,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走进人民:“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习仲勋优秀的政治品质突出地表现在他热爱人民,关心人民,时刻想着人民,洞悉人民群众的疾苦,实实在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想戴。1943年2月,刚就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就提出“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的要求。他深入农村、总结经验,了解群众的冷暖,领导当地的大生产运动、“三三制”政权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正是在这种自觉的服务意识主导下,习仲勋带领地委干部将地处边区北大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绥德治理得有声有色。1944年秋,在绥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习仲勋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讲话,特别强调如何将服务群众的意识转化成实际行动:第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第二,不当“官”和“老爷”。第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不仅对司法干部如此要求,还要求其他部门的干部也要深入基层,转变作风,真正为群众想办法,办实事。曾和习仲勋从绥德一路赶往延安的美国学者李敦白回忆:“他走到哪里,好像每一个村庄都有认识的人,他碰到这个人说,你婆姨的病好了没有,碰到那个人说,你爸爸的腰疼好了没有。”

正是因为十分注重贯彻群众路线,所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习仲勋都非常强调脱离群众的危险。习仲勋虽然身居要职,却一直认为和群众是平等的,绝不凌驾于群众之上。他出去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不搞排场,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为此,他约法三章:无论去哪里,第一,不要搞带路车,不要警车开道;第二,不要布置路线,不要封路;第三,不要鸣警笛。

1985年11月,习仲勋到江西考察。汽车行进中,突然遇到道路堵塞情况。前车为了加快速度,鸣响了警笛,工作人员从车窗内伸出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提示来往车辆注意让道。路旁施工的民工、行人以及来往车辆的乘客都把目光投向这个车队。习仲勋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也可能会把来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为保证

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车。告诉前面的同志,他们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汽车中途停车后,习仲勋快步走向警车,亲自向警车上的同志申明自己的意见。

他曾告诫大家,当干部的“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

服务人民:“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爱民、知民、为民的赤子情怀,即便经历了“文革”的长期磨难,却久而弥笃。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面对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现实,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赋予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特区,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1978年4月,在听完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同志的汇报后,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这段惊心动魄而又荡气回肠的历史进程中,习仲勋说过:“特区之特,关键在敢于改革,敢于试验,敢于牺牲。这个特,不是指在生活上特,不是要脱离群众。敢试,有时候可能会试错,这没有关系,顶多不就是一个乌纱帽嘛”。习仲勋敢想、敢干、敢于担当,给刚刚起步的改革事业带来了有力的支撑和推动。这种果敢与实干,同样源于他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对民生福祉的关切。

当年,“逃港风”问题严重,有人说偷渡外逃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犯罪,必须坐牢。习仲勋经过大量调查,发现一些群众之所以要偷渡外逃,根源还是在于生存遇到了危机。当时的广东相当穷困:5500万人,1000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鱼吃也没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而吃的主菜是被称为“无缝钢管”的空心菜。“逃港潮”的一时泛滥,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更是经济上出了问题。因而,习仲勋一方面坚决反对把偷渡外逃的群众视为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加快改革步伐,推动特区建设,用发展这把钥匙破解温饱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

态度、体察民间疾苦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让人感奋,什么是“为民务实”,这就是最好的诠释。

依靠人民:“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纵观往圣先贤的有关论述,毋庸置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发扬。历史反复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不论是打江山,还是坐江山,人民群众都是靠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谁得罪了人民,谁就会被淘汰出局。

在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期间,他数次身处险境,是当地群众拼尽全力掩护他,悉心照顾他。习仲勋晚年曾深有感慨地回忆说:“当敌人围剿的时候,每当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不需要转移。每当危险的关头,人民群众自然会挺身而出,保护我的安全。”

由于群众基础牢固,习仲勋在战争年代屡次遇险,都能在群众的保护下安然无恙。1933年5月,习仲勋赴薛家寨东南十多里外的北梁开会,在陈家坡遭遇国民党地方民团,激战中腰部被子弹击伤,鲜血顿时染红了衣衫,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千钧一发之际,他厉声命令:“不要管我,你们赶快钻梢林!”由于敌众我寡,不幸被俘。这是习仲勋一生最危险的时刻。幸亏被同情革命的民团小头目周致祥私放,才逃过一劫。在躲避追捕的过程中,他拼命滚下一个大沟坡,被半坡一棵树挡住,摔得遍体鳞伤。他在崎岖的山道上艰难爬行,喝河水解渴,幸亏得到柳林村贫苦农民郑老四和他的妻子的细心照顾,才幸免于难。

1933年底,习仲勋根据陕甘边特委决定,秘密离开薛家寨,在附近农村隐蔽下来,相机开展群众工作和接应撤离队伍。由于敌强我弱,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撤离,根据地处于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习仲勋仍留在照金从事革命活动。他有群众基础,白天藏入密林,晚上出来坚持做群众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得到多位地方群众的掩护照顾。习仲勋回忆,一位农民王大娘,“半夜里把我从山林中叫回来,在她家里给我吃米饭,做猪耳朵肉,有时还把白糖也给我送来。”不久,习仲勋随游击队转移到甘肃境内,突患严重伤寒病,难以行军,于是“住在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也有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我送到山里,晚上

又接回来吃饭。在这里又养了一段病”。

1990年习仲勋在接见正宁籍著名作家张俊彪时,深情的说:“正宁,当时叫新正,是关中分区。那里村庄我跑遍了,而且在很多村庄住过,你要是不信,随便说一个村子的地理地貌,我马上说出那个村名来;还有,如今只要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你随便说一个人的貌相,再说他是那个村子的,我就一口能说出他叫什么名字,住在村子的那个位置,家里有几只窑洞,院里或者崖头有什么树,这人都做过什么,尤其是对革命有过什么贡献……”

习仲勋同志热爱人民、一心为民的赤子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时,习仲勋在天安门上观礼,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习仲勋的群众观念以及对待群众的具体工作方法,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追求和人民立场。他

曾说过:“不管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这正是习仲勋从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群众领袖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道路上走向胜利的精神写照。“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今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最关键的是要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系群众、执政为民的政治品质,坚持人民至上,“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躬身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力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

责任编辑:张凤玲

(上接第67页)

参考文献

- [1] 张君.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新时代的关键抉择[J]. 东吴学术, 2023(02): 98-107.
- [2] 王永香, 李忠鹏.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五重维度[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7(02): 30-40.
- [3] 王成, 李珊珊. 试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和合”文化意蕴[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4(02): 125-133.
- [4] 伍俊斌. 网络协商民主的困境与战略分析[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8(04): 117-125+168.
- [5] 刘经纬, 刘晓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J]. 理论视野, 2024(04): 45-50.
- [6] 余卫国.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论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01): 33-41.
- [7] 汪仲启. 互动与聚合: 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动力与边界[J]. 学术月刊, 2019, 51(03): 82-94.
- [8] 罗依平, 汤资岚, 刘思思.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研究[J]. 理论探讨, 2019(05): 64-69.
- [9] 王丽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探析[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11): 85-92.
- [10] 孙越, 刘焕明.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维度研究[J]. 学习与探索, 2022(11): 24-30.

责任编辑 张凤玲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 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省工商联

党的二十大站在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科学谋划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报告指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新时代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的制胜之道。站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要强化历史自觉、历史担当、历史主动,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学习领会党中央关于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理论方针政策相结合,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用,为加快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

一、充分认识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

(一)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策演进来看,党的十二大把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民营经济的发展上升为党和国家

的一项大政方针;二十大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并明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等诸多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工作的高度重视,宣示了我们党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坚定决心。

(二)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推动发展、改善民生、促进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各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营经济取得了从“0”至“56789”的伟大成就(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就我省而言,截至2022年底,全省民营企业54.73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148.73万户,占全省市场主体的98.3%;民间投资占比达到42.4%;民营企业进出口值186.3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1.9%。民营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累计认定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254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29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5户。实践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我们能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功不可没。

(三)民营经济人士是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

靠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者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改革开放以来,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用的变化相适应,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社会属性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关心民营经济人士的成长和作用发挥。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并明确要求统战部门、工商联“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既关注他们的思想,又关注他们的困难”。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2018年11月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新论断,这是在“建设者”基础上的升华。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弘扬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把民营经济人士的地位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面对的新课题

(一)看清新形势找准新定位。近年来,全球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上升,“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和两大变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大国关系博弈等)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从国际看,受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和芯片法案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部分断裂等超预期因素影响,美元升值、市场波动等风险上升,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挑战,直接影响着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从国内看,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最关键的是要实现自主创新、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地位和供应链自主性。而这恰恰是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短板所在,民营企业要实现脱胎换骨、迭代升级,必须在科技、市场、人才、现代企业制度等关键要素上攻坚克难,有效破解缺电、缺人、缺芯等制约自身发展的问题。从我省看,民营经济发展整体仍然处于规模较小、创新不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阶段,民营经济规模和质量亟待提升(每万人拥有市场主体数量774家,低于西北平均的993家和全国平均的1097家水平),民营企业占全省民营经济市场主体的比例偏低(25.3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1.42%),头部企业实力偏弱(近5年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入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营商环境有待改善(据全国工商联2022年度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显示,甘肃省营商环境评价得分在全国31个省份中位居第28位)。同时,我省民营企业还存在法人治理水平不高、品牌构建能力弱、人才缺乏等问题,造成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及科技打压和芯片禁运,面对我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差距,如何抢抓全球科技发展先机,在基础前沿领域奋勇争先,如何化危为机、赢得发展主动,如何实现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突破,是党和政府与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

(二)挖掘新优势把握新机遇。虽然面临诸多考验,但我国经济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发展潜力大、韧性足、空间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民营经济发展依然面临重大机遇。从发展基础看,2022年我国GDP已达121万亿(18万亿美元,增长3%),相当于美国25万亿美元的72%。人均GDP达到8.57万元(1.27万美元),跨过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根据各大权威机构的预测,随着防疫措施的优化,叠加2022年的低基数效应,2023年中国经济将强劲反弹,增速不会低于4%,乐观预计甚至能达到6%。我省经济在2022年承压而上、逆势而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1.12万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5%,增速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位。从政策机遇看,党的二十大响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新的重大论述,释放了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强烈信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发出近五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强音”。省委省政府“着力构建亲清统一新型政商

关系,建立领导干部包抓联企业制度,真心实意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给予公平政策支持,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等政策,体现了全力抓经济促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省抢抓机遇,追赶进位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继续发挥好统一战线在协调关系、教育引导方面的独特优势,推动要素和资源更多的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聚合集中,引导民营企业将发展机遇、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动力,在新一轮竞争中实现更大发展。

(三)着眼新发展聚焦新难题。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与民营企业发展利益息息相关,与民营经济人士的思想状况紧密相连。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放在新发展视野下高度关注、集中破解。一是观念的转变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越重要,民营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责任就越大。但部分干部没有充分认识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没有及时跟进了解民营经济代表人士的多元化诉求,仍然沿袭老的工作方法、旧的工作思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效能不高、效果不好,与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新情况、新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工作思路的转变跟不上工作对象的变化。随着新老企业家的迭代更替,民营经济队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民营经济年轻一代,既不同于老一辈的工商业者,也不同于其他统战对象,他们成长环境优越,缺少父辈们吃苦耐劳精神,缺乏对我国国情和社会的全面了解,现实思想活跃、前卫、复杂、多元,这都对新时代统战工作提出了挑战。三是政治身份的转变跟不上参政议政的需求。民营企业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有政治安排的群体,一般都是各个行业的领军任务,他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度比较高,参政议政的愿望也比较强。但在实际参政议政履职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有的虽有政治参与的热情但缺少参政经验和理论水平;有的站位不高,在关心行业、群体、社会利益上不够专注,而是凭借手中的政治资源,为自身企业谋取利益;还有的把当代表、做委员当作政治待遇或者是身份的象征,当作可以近距离

接触权力部门和党政人士的捷径,热衷于拉关系走后门,等等。这些现象都可能滋生不正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战工作的整体效能。

三、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着力重点

面对新征程新形势新任务,促进“两个健康”,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找准工作着力点。

(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教育引导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经济统战工作的首要位置。一是以科学理论武装人。要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自觉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拥护“两个确立”,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是以理想信念鼓舞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建好用好理想信念教育基地,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切实增进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实践认同和情感认同,始终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三是以党的政策指引人。分层分类开展政策宣讲和专题培训,及时解疑释惑,持续传递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定立场,增强民营经济人士发展的信心和信念。引导民营企业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树立科技自立自强理念,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坚定不移走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之路。

(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应有之义。一是完善问题反馈体系。发挥好统战部门、工商联、行业商协会联系企业紧密的优势,深入企业、靠前服务,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大局和民营经济关键领域热点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及时了解反馈企业存在的困难问题,研究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推动有关部门完善政策、改进工作。二是完善服务保障体系。积极搭平台、建机制、聚合力,进一步整合统一战线内部和政府职能部门各类资源和力量,构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作平台、对接机制和服务载体,形成

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三是完善社会回馈体系。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增强家国情怀,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财富观,坚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公益慈善事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做到富而有德、富而有爱、富而有责,努力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三)推动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出的重要要求,对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促进“两个健康”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真正落实“自己人”要求。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自己人”的重要论断,始终坚持“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工作方针,坚持“亲”而有度、“清”而有为,主动作为、靠前服务,营造政企彼此信任的氛围,做到“近中求进”“清上加亲”,共同构建和维护亲清政商关系。二是建立健全政商沟通制度。创新沟通协商形式,制定规范政商交往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制定完善重大政策前征询企业家意见制度、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和商会制度、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企业家联谊交友等制度,通过“一对一”“点对点”“面对面”“平台对平台”等方式,达到沟通效果,共商解决办法,推动政企沟通协商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三是完善维权服务体系。建立完善民营企业诉求反映和权益维护机制,用好民营企业法律维权服务中心和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平台载体,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民营经济人士依法理性反映诉求、维护权益,依法维护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尊重和保护企业家合法人身和财产权益。

(四)大力培养代表人士队伍。选准育强用好民营经济代表人士,是促进“两个健康”的关键环节。一是注重质量,把优秀代表选出来。坚持“三强一好”标准(思想政治性强、行业代表性强、参政议政能力强、社会信誉好),充分发挥工商联在民营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中的主渠道作用,建立代表人士履职考核

制度和退出机制,改进民营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做到“凡进必评”“真评真用”。二是优化结构,把梯次队伍建起来。针对当前民营企业队伍正处在新老传承和代际交替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着眼民营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年轻一代企业家教育培养,制定实施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计划,着力培育一批领军龙头企业、创新成长企业家、企业家高管队伍,努力实现民营经济人士队伍新老交接和有序传承。三是加强引导,把典型示范作用发挥出来。选出一批先进典型,发挥其自身影响力大、带动作用强的优势,引导带动广大民营企业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引领其带动整个行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当好本领域、本行业民营企业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领路人”。

(五)发挥工商联和商会作用。工商联及所属商会是党和政府联系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重要组织依托和抓手。一是推动统战工作向商会有效覆盖。履行工商联党组对所属商会党建工作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商会党的建设,积极培育和发展中国特色商会组织,探索中国特色商会组织发展道路。支持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中心工作,积极培育全产业链商会和商会联盟,覆盖民营经济发展的各个行业和领域。对以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为主体的行业协会商会,工商联要加强联系、指导和服务。二是推进工商联改革发展。充分发挥好工商联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中的作用,积极探索更好发挥工商联作为总商会功能的有效形式,加快推进“网上工商联”建设,进一步提升工作整体效能,努力把工商联建成“民营经济人士之家”。充分发挥工商联优势,围绕促进“两个健康”工作主题,积极探索彰显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有机统一优势的体制、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不断增强工商联的凝聚力、执行力、影响力。

责任编辑:常海哲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路选择

兰州交通大学

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联动融合,是新历史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进路选择,核心是找到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和推进方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和措施的结合点,在由政治、经济、空间、制度、文化以及人本身构成的综合体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领导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型大一统基础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巩固和完善新型大一统国家体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大一统的核心保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核心,建构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机制和政治保障机制。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的要求是保障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通过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将各民族凝聚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将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初心使命,同时具有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具有先进思想指导,继承和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转变。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点任务,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具有领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力量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既有自发因素,也需要进行规范建构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延续和发展更需要规范力量的维护和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新型大一统国家建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塑造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和制度体系将中华民族重新整合,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新的政治依托和思想元素,推动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组织和制度是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引领、组织引领和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的纵横组织体系是跨民族的政党组织网络,吸纳各个民族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体系嵌入全社会各领域,高效严密覆盖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方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其他组织和机构无可替代的思想、组织和制度资源。

再次,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

以共同的政治信仰作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基本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试错选择的结果,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基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看,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认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各民族具体利益。在社会主义奋斗进程中,民族平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语言文字以及文化遗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得到尊重和保护。同时,现代化客观要求各民族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即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这一过程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

二、完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体系,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度化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内蕴含着建构和维护新型大一统国家的政治要求,为建构和维护新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提供制度安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巩固新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制度体系,提升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水平,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到完善国家治理制度的全过程,通过制度维护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国家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

首先,坚持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自觉建构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人民共享平等的民主权利,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稳定牢固存在和发展的群众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进一步发展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保障各民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内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使各族人民享有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民主渠道,以

此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体现大统战格局要求,民族宗教等统一战线工作要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民族宗教领域的统一战线基层工作的基础,提升民族宗教等统一战线工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地方层面,要按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确贯彻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措施,创新民族区域自治实施,加强党对民族区域自治的领导,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更为协调、更为契合。在社会层面,要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国新型大一统国家制度的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增强中华民族整体意识。

其次,坚持和完善跨民族国家治理制度。国家治理制度的安排设计要注重对新型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和维护,重视增强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及一致性,充分发挥制度在塑造统一性和增进共同性中的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按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完善和发展跨民族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教育等治理制度体系。所谓跨民族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就是不分民族,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接受同等的治理体系规范,纠正按照民族身份进行区别对待和实施民族优惠或者少数民族例外论、少数民族特殊论。在政治法律方面,公民身份为主,民族身份不应成为权利优惠或者责任豁免的理由。在文化教育方面,要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要推进少数民族教育现代化,提升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水平,保证少数民族少年儿童能够接受义务教育,从根本上提升各民族人口素质。

再次,坚持和完善总体国家安全制度。中国式现代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需要国家安全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工程,解决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打击防范治理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和基础。要维护边疆安全,边疆安全有赖于少数民族的参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需要边

疆稳定安全。要维护生态安全,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大多是生态涵养重要区域,也是生态脆弱区域,要维护少数民族区域生态安全,保护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家园,防止无序过度开发。要维护文化安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中华文化主体地位,传承发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三、加快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物质基础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要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工程。

首先,全面扎实落实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举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难点是广大乡村地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三者在地域上多有重合,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因此,要根据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战略安排,统筹科学制定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要切实落地落实党和国家制定的有关推进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在新疆和西藏地区,要将新时代党的治疆治藏方略落到实处,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为社会长治久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要发挥国家政策叠加优势,将“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与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发挥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建构发展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强化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抓住新一轮人工智能信息化科技革命起步的历史机遇,通过政策与技术的综合发力,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差距,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

其次,进一步扩大和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开放开发水平。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助推动力。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于陆地边疆或者内陆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沿海区域相比较,有效的

大规模开放存在各种困难,这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新一轮陆疆开放开发提供了战略政策契机。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地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重点建设的地区。要进一步加强与陆上邻国的外交关系建设,强化双边或者多边经济贸易关系,扩大陆上开放力度,西南、西北、东北、北部边疆开放空间巨大,经济发展潜力和合作前景广阔。通过陆疆开放开发,将传统意义上的陆上边疆建设打造成为国家开放窗口和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构建沿海与沿边开放共同发展的格局,将极大地重构中国对外开放和国内经济发展格局版图。

再次,切实提升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国家推动的对口支援合作与自我内生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两种基本方式。1949年以来,国家一直注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帮扶,为少数民族在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持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倾斜,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家在中央各项倾斜照顾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制定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东部省、市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省、自治区实行全方位的对口支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在坚持中央政策倾斜和对口支援基础上,大力激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内生动力,提升少数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主要是形成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生态,包括发展文化、发展制度、发展人才、发展产业等,要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外循环中,建构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地位、角色和优势,从政府政策推动向产业经济自发驱动转变,实现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四、推进各民族的“人的现代化”,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境界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推进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的同时,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协调,促进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统一,推进各民族的“人的现代化”,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提升民族整体精神境界。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价值要求。

首先,推进各民族的人的生存方式现代化。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起点。中国各民族分布在广阔的地理空间,形成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传统中国核心区域以农耕为生存方式,边缘少数民族以游牧为主要生存方式,民族融合地带农牧并存。现代化社会是传统农业和游牧为主的生产结构向工商为主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表现为城市化进程,城市是现代化的主要空间载体。推进各民族的“人的现代化”,要推进农业牧业的现代化转型,建立现代化农业牧业新模式,同时转移农业牧业富余人口到城市生活就业,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少数民族城市化为少数民族人口现代化提供了主要路径和根本性方法,城市化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成为少数民族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支撑,为少数民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动力,

其次,推进各民族的人的价值结构的现代化。中华大地上共同创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的地方性民族性文化形态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和文化资源,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观的基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和现代性发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共享的现代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是传统经济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与现代化经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需要结合现代化经济社会的要求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建构面向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其中,宗教对于少数民族具有重要影响。推进各民族的人的价值结构现代化,需要正确对待宗教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一方面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另一方面要引导我国宗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在稳定社会、团结民众方面的积极作用,范宗教的消极负面作用,打击各种非法宗教活动。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践行,使之成为各民族共同遵奉和践行的价值结构底色和根基。

再次,构建现代社会关系推进各民族的普遍交往。社会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社会交往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人的现代化既包括人的个体的现代化,同时蕴含着人与人的关系的现代化要求。现代社会关系,是从传统的自然特征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基础转变为规范性的契约为基础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民族、血缘、地域、宗族等形成身份政治和身份文化,在现代社会,诸如此类的自然特征不再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以无差别的法律为基础的平等社会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破除民族之间的身份壁垒和身份区隔,构建现代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民族身份不应该作为社会交往的标签和障碍,而应以公民、人民、群众等一般性身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普遍交往。

五、设计中华文明现代化新标识,传播中华民族现代化新形象

现代化的内容将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出来,形成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标识。世界上不同现代化道路将形成不同的现代化标识。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标识。作为中华民族新标识。在长期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标识性的特色形象,诸如服饰、饮食、音乐、礼仪、舞蹈、医药、建筑等,是各民族共同认同的形象符号。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赋予传统形象以新的内涵,同时需要创造新的文化认同标识,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标识。

首先,推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标识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文明具有延续性,从文明产生开始,连续性演化发展,绵延不绝,未曾中断,形成了长期认同的鲜明的文化标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对文化形象、神话记忆、文化叙事、历史书写、民俗节日等传统文化标识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深入挖掘和扩展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资源,赋予新的时代意义,通过现代化技术、语言、方式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新的文化标识。

其次,建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审美、需求等,建构以中华服饰、中华礼仪、中华音乐、中华饮食、中华舞蹈、中华武术、中华医药、中华建筑等内容为载体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这是一项系统复杂严肃的综合性工程,一方面需要国家顶层的引导、规划和支持,更需要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躬身实践。

再次,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集中空间载体。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级各类博物馆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集中空间载体,以具体可感实物直观呈现出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加强和完善传统各级各类博物馆建设的同时,要增加各级各类博物馆中民族交融交往交流的内容,推进各级各类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扩大各级各类博物馆的普及化和影响力。同时,要规划建设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专门博物馆、展览馆,有条件的大中小学校要设立专门的展览室展览馆,收集呈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关的古今文物,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创中华民族历史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立体图景,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博物馆展览馆的设计布局以及运营方式,集中呈现具体的考古文物、立体雕塑、摄影、书画等,将其寓以青少年的日常教学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六、结语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探索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视角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意义,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和扩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生态保护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反映了各民族共同愿望和价值追求,其本质要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旨归相契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熔铸现代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华民族复兴具有全新的图景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重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辉煌,更将创造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在现代化中的新形象。为此,要进一步树立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以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的奋斗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责任编辑:常海哲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2024 年选题方向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秉持学术宗旨,提倡严谨治学,鼓励理论创新,关注实证研究,是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统一战线类内部刊物(季刊),设置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统一战线工作、中华文化、民族宗教等专题栏目。2024 年本刊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的“12 个必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两个结合、中华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宗教中国化方向等专题,结合甘肃统战工作,推出重点选题方向,诚邀省内外专家学者惠赐大作。

- 1.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研究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3.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 4.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
- 5.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 6.统一战线与“两个结合”
- 7.新时代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研究
- 8.新时代做好统战工作规律研究
- 9.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为甘肃现代化建设凝心聚力
- 10.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
- 11.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研究
- 1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1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15.宗教中国化研究
- 16.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研究
- 17.新时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研究
- 18.新时代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研究
- 19.新时代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研究
- 20.新时代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
- 21.新时代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作用研究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专家学者赐稿!

本刊联系方式如下:

编辑部电话:0931-7783804

学报投稿邮箱:gstzllyj@126.com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编辑部

